

編者的話

这本书里所收集的文章，都是我們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刻骨仇恨的纪录。

这些文章以血淋淋的事实，告訴我們：资本家对工人的剝削是多么殘酷，手段是多么毒辣；他們为了牟取暴利怎样投机取巧、欺騙詭詐、弄虛作假。这些文章以具体的事例，告訴我們：創造了社会財富的工人怎样在资本家的压榨下过着非人的生活，而腐朽的资本家又如何殘酷地吮吸工人血汗，变成了百万富翁。虽然，这些文章里写到的事实，和旧社会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罪恶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它毕竟描繪了几幅资本家的嘴臉：祥生汽車公司的老板和永福源五金厂的老板周錫生、沈杏娣，凶殘如虎豹，他們随意打罵工人，对徒工更是穷凶极恶；漣源鋼铁厂的资本家李猴子，奸險似豺狼，他从不发脾气，說話之前先打哈哈，对工人

称兄道弟，滿口說的是“有飯大家吃”、“同甘共苦”，暗地里却想方設法、再三再四地降低工人的工資，直到置人死地。那个“笑面狼”和“和气”的掌柜，他們对工人看来多么“亲切”和“关怀”，但是他实际上却是为了使工人夜以继日地为他干活；否則就一脚踢开；《柜台生活四十一年》里的資本家則是不折不扣的騙子手，他公开宣称：做生意就是要“哄、噱、騙”，在他看来，坑害別人来喂肥自己是天經地义的事情。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形象，使我們看到：資本家虽行业不同、身份有別、性情各异，但在剝削人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为唯利是图、損人利己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

有压迫有剝削，就有反抗有斗争，革命斗争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客观规律。中国工人阶级从誕生时起，就同資產階級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的主人。由于我們編选本书主要目的是为了揭露資產階級的剝削本质，因此，对反映工人斗争方面的作品，未更多的选入。但就从所收录的許多文章中也可看出，工人阶级是决不会心甘情愿、俯首貼耳地受压迫受剝削的，他們經常在反抗和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对于曾经亲身受过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职工群众来说，重新认识一下资产阶级的剥削罪行，是很必要的；而对于没有亲身受过剥削、对资产阶级的本质还缺乏深刻认识的青年，就尤为重要了。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资产阶级，更加痛恨资本主义，热爱社会主义。我们编选这本集子，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牢牢记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目 录

- 在“40000”的后面…………… 黄玉成（1）
- “走投无路落油車”…………… 王才根（13）
- 刻骨仇…………… 陈福生（25）
- 地下的奴隶…………… 党 非（40）
- 濃霧中的岁月…………… 楊桂清（49）
- 笑面狼…………… 紀 哲（56）
- “和气”的掌柜…………… 孟广运（63）
- 童工血泪…………… 施灿荣（67）
- 徒工坟…………… 王信敏（81）
- 昔日“华贞”…………… 顾 方（90）
- 柜台生活四十一年…………… 曹杏声（106）
- “药老虎”发家史…………… 張文显（121）

在“40000”的后面

黄玉成

解放前，上海人看到“40000”这个号码，就晓得这是“祥生汽车公司”的电话号头。就在这个号码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罪恶！

半辆汽车起家

祥生汽车公司老板(简称祥生老板)本来是“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的西崽。这个饭店进进出出都是些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洋人。当时，祥生老板看到这些洋人来来去去都要坐出差汽车，而那时上海经营出差汽车的只有一个美国商人，出差汽车总共不过几辆。祥生老板眼看出差汽车生意好，赚钱多(每小时要收车费四、五块银元)，他就在一九二〇年向人借了点钱，拼拼凑凑，和别人合伙购买

了一辆杂牌货旧蓬車，临时雇了个司机，抛崗在“礼查飯店”門口，专攬洋人的生意。以后，他又通过投机取巧、买空卖空的手段，套进了四辆汽車，就在武昌路开起“祥生汽車行”来了。

祥生老板懂得，在上海滩上站住脚，首先要依靠外商买办，勾結流氓地痞，做自己的后台老板。不久，祥生老板很快就与几家洋行的买办拉上了关系，巴結上了上海大流氓杜月笙，并买了个什么“特別巡捕”的头銜，結果車子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在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上海的时期，祥生老板又投大汉奸吳世宝之好，亲自送去了一辆汽車。他还依靠沪西大流氓朱順林，一手包攬“好萊塢”、“六国飯店”等大賭場、舞厅和大飯店、火車站、輪船碼頭、机场等专利业务。汉奸陆連奎死了老婆，祥生老板就免費出借五十辆汽車給汉奸出丧用。他一面討好汉奸，一面就大做“祥生出差汽車广告”，給他弄得哄动一时。

抗战胜利后，祥生老板勾結国民党特工头子陆京士，还送給陆京士三辆汽車。他自己也“官运亨通”，挂上了一个什么“上校”头銜，来欺压工人，欺压人民。

祥生老板有了依靠，有了后台，就更加残酷地剥削职工，“日进斗金”、“财运亨通”，不过二三十年工夫，它竟成为上海最大的出差汽车公司之一。当时它拥有二百七十多辆汽车，雇有五百五十多个职工，并设置汽车站二十一处，还建立了一千多平方米的汽车修理保养车间。那时祥生汽车公司真是显赫一时。这还不算，祥生老板还到处搭股，如过去的中国纺织厂、亚洲银行、中国国货公司、民谊药厂、金门饭店、大鸿运酒楼、康乐酒家、浴德池、大众殡仪馆等等，都有他的股份，并兼任近十多家企业的总经理职务。

要命的“三保”

祥生老板对职工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一个司机要想进祥生汽车公司，除了要拿出五担米的代价向祥生老板的亲信作为运动费外，还要向祥生老板交上“三保”（现金保、铺保、连环保）。

司机进祥生，先要拿出一百块银洋作为上工的保证金。很多司机为了向祥生老板交上一百元的保证金，只得把家里所剩无几的东西卖光、当光，或者去借高利贷。这样很多司机虽然进了祥生汽车公

司，但一年到头就是借債、还債、欠債，没有一个尽头。如有个姓刘的司机，当时失业，一家七口生活无着，但为了找工作，好容易凑些錢七轉八弯地請人介紹进祥生汽車公司。为了向祥生老板交上一百元的“保證金”，他餓着肚子天天东奔西走，向亲友只借到二十塊錢，还差八十元，没有办法，心一橫，咬着牙借了八十元“印子錢”。他工作是有了，但家里連鍋盖也揭不开，全家望眼欲穿，直熬到发工資那天，拿到了十几塊錢工資，祥生老板亲信要他送礼，高利貸者逼他还債。这样一来，哪里还有錢拿回去养家活口，全家只得繼續挨餓。为了生活，他只好再去借高利貸。有个姓蕭的司机下手，为了想做司机可以多有一点收入，就在总站里請大家帮助，向其他司机借錢，五角、一元，零零碎碎湊到几十塊錢。祥生老板知道这件事后，竟說他是在这里搞鬼，把姓蕭的停工了。

祥生老板所規定的“現金保”，实际上是一种强盜式的掠奪。

有了“現金保”不算，老板还規定司机要找到洋行、錢庄、百貨公司之类的行商做鋪保。一般的小商小店，如剃头店、水鋪、裁縫店、烟紙店的保都

不要。所以进祥生汽車公司的司机，都要花很大的周折和代价，托人求情，送錢送礼，求那些行商老板做鋪保。祥生老板在保单上規定：“……如有不測，乃由天命，与本公司无关……立志願书人和保证人不得借故要挾本公司……”这样，老板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剝削司机了。司机呢，逢年逢节还要向做鋪保的老板送錢送礼，否則就不太平，就有被解雇的危險。例如有年中秋节，有个姓刘的司机实在无錢送礼，保证人一气之下，就跑上門，吵着要去退保，这个司机虽然心里十分气憤，但为了保住飯碗，只得借了二十块錢送去，方才了事。

有些司机实在找不到老板規定的鋪保，就只好送錢送礼，托人买通老板的亲信，去向祥生老板說情，找三、五个現职司机做自己的“連环保”保人。但倘若这个司机一旦出了个什么大事故，賠償不了祥生老板的“損失”时，那被圈在一起的“連环保”司机，就要共同分担“責任”，賠償祥生老板所規定的莫名其妙的“損失”。

好長的工作時間

祥生老板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用少雇

人、多出差的办法，規定每个司机要連續做三天三夜七十二个小时，才得休息一天。很多司机为了糊口，常常帶病开车。有的实在煎熬不住，就把車开到半途停下来，向乘客打个招呼，借口去小便，乘机闭一闭眼睛，或站在風头里吹一吹，透口气。有的司机为了提神，就用万金油塗在眼皮上刺激一下。有的还用香烟头含在嘴里咀嚼，强打精神。这样就常常发生行車事故。发生事故后，倒霉的还是司机，祥生老板是一毛不拔的。

往往还发生这种极为悲惨的事：一部分司机实在支撑不住，病倒了，在班上的司机就是連續做了三天三夜，也不允許下班。祥生老板为了賺錢，哪管司机死活！看見誰下班，就用解雇来威胁。司机为了保住飯碗，只得硬着头皮、睜着两只布滿血絲的眼睛为老板卖命。有的司机就这样被逼連續干五天五夜、六天六夜。有个叫陆麟书的司机，連續做了近百小时后，实在做不动了，要求老板让他請一天假休息休息。老板对他說：“你要休息，請你回家去休息，上海找一只狗倒不大容易，招一百个开車的很便当。”老板說着看看陆麟书还不出車，就又威胁說：“你还站在此地不动，有一分钟算一分钟，按

時間，我扣你錢！”陸麟書只得把車勉強開走。他自己心里明白，若再開下去，一定要出事，什麼開除不開除也管不了許多了，就把車開進總站，決定回去休息一下。他昏昏沉沉地離開車子，搖搖晃晃地離開車站，剛過馬路，還沒走滿百步，就在金城電影院（現在的黃浦劇場）門口，雙手抱着電綫木杆，活活地累死了。

那時，這種悲慘的事是常常發生的。司機孫福柱，也因開車時間過長，疲勞過度，一天，當他把車子開到保修車間換汽車座墊時，竟彎着腰，兩手撐在坐墊上，死在車廂里。司機郭祥雲因勞累過度，在東湖路汽車站暴死。司機丁慶祥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後，就倒在地上死了。這種例子舉不勝舉。工人累死了，老板根本不負任何責任。

拿不到的工資

祥生老板對工人的剝削，同所有的資本家一樣，真是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他還訂了很多規定來榨取工人的血汗。其中僅賠款這一條，就壓得工人喘不過氣來。

當時司機的工資，每月只有二十元左右，而老

板对司机少得可怜的工资也要想出种种罚款赔偿办法，把它捞回去。如车子放出去，乘客跑了，就要在司机工资中扣除“空放回票款”。司机送走乘客，空车回站时，因为路上车多塞挡，或多遇上了几次红灯，或者其他原因而超过回站规定时间，就要扣司机的“过时款”。有些司机因连续做了八九十个小时，偶尔在车厢里打个瞌睡，也要罚款。如有个叫王福祥的司机，一次在半夜里出差后，疲倦极了，想稍为闭一闭眼睛休息一下，谁知竟睡着了，直睡到天亮才醒。当他赶忙把车子开到总站车库时，老板竟要按照实际出差时间如数交款二十多元。后来再三交涉，还是赔了八块钱才了结。

有时，车子进站放不下，司机只得把车子停在马路旁，等调档再进车库。这时，要是被伪警看到，就要抄号码。第二天，“新衙门”（伪法院）就会来传票，把司机叫去罚款，而祥生老板可以一点不负责任。当时，司机被“新衙门”叫去罚款的名堂，也是多如牛毛，花样百出。如闯了红灯，就要罚五、六块钱，甚至连多撒几下喇叭也要罚款。据说有个司机犯了所谓“新衙门”的“禁规”，来传票要罚他一块钱。当时这个司机因有急事，就借了一块钱托一

个学徒去代罰。这个学徒跑到“新衙門”，他想想气不过，就为这个司机讲了几句公道話，誰知惹怒了“新衙門”的伪法警，說他无理取鬧、搗乱法院，定要罰他大洋十块。

司机出差，倘若碰到美国的烂水手(海軍)，就倒楣了。这些烂水手經常使坏，把車窗、座墊、車廂內的設備弄坏，然后揚长而去。倒楣的是司机，又要被扣除車輛設備损坏賠償費。还有，司机經常碰到的是：車輛被碰碰擦擦，如果擦去一些漆，老板就要按照被擦去漆的面积大小，要司机賠償，少則二元、三元，多則竟要赔上一二十元，甚至要司机完全赔新的。如汽車叶子板被碰擦，赔的更多。被碰擦的旧叶子板被挂起来，司机称之为挂“火腿”。过些时候，老板又把它拿下来，重新补一补，漆一漆，再換到另外車輛上去。这要赔那要罰，当时司机名义上有工資，实际上很多司机連一半工資也拿不到手，有的还要倒貼給老板。据說，有一次发工資时，去拿工資的只有寥寥几个人，因为大部分司机的工資被扣除了还不够抵偿，所以有的人都不敢去拿了。

司机因操作关系，或者忘記加水，或者車輛本

身問題，或者与会車相撞而造成車輛机械設備的損壞，司機都得賠償，多的几十元、上百元不等。有些司機為了賠償，被逼得家破人亡。有个司機叫邱云來，有一天闖了車禍，祥生老板叫顧問律師去打官司，后来說是官司打輸了，老板要邱云來全部賠償，甚至還要邱云來出打官司的費用。邱云來將自己家里所有東西賣光，還不够付賠償費。他被逼得無路可走，一個人偷偷地跑到現在的瑞金二路的一條小胡同里吊死了。司機車永才也是因為賠不起二百八十塊銀洋，上吊自盡的。

軟硬兼施

當司機被逼得走投無路時，大家就團結起來罷工鬥爭。祥生老板為了分化工人，磨滅工人的鬥志，就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來對付工人，對付司機。

軟的，就是拿出一點經費辦“司機同人俱樂部”，用騙、拉、拖的方式，引誘司機到俱樂部去玩樂、賭博。有的司機覺悟高，當然不上他那圈套；有的司機覺悟低些，整天開車，沒有任何娛樂，因此，上當的也不少。老板的亲信還叫自己的大小老婆住到俱樂部里來，聚賭抽頭。誰輸了錢，老板的亲信就

假装关心的样子，以低利息借给他再赌，结果谁借得多，就输得多。这样一来，输钱的司机就无形之间被他们控制了。如有个叫小山东阿四的，单身一人，被骗去赌博，向老板的亲信借了不少钱。到了冬天，他身上只穿一套单衣，洗车子时，赤着脚在冰滑的水门汀上走来走去。他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与其他司机一起要求增加工资，这时，老板的亲信马上出来向他逼债。

对有的司机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硬的，就是从打骂直到开除。祥生老板是喜怒无常的，当他不高兴时，就对司机拳打脚踢，拿鸡毛掸子随便抽人，有时连职员也不能幸免。祥生老板对于那些敢于参加罢工斗争的人，就大批开除。有一次，一下子就开除三十六个司机。有的还被拘捕用刑。如有个姓吕的司机，积极参加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老板就诬告他偷公司的汽油，并贿赂伪警察局将他捉去坐牢。

祥生老板为了对付司机的反抗，除了勾结反动势力，四布走狗爪牙外，还特地招收部分外国侨民作司机，来监视中国司机。如中国司机起来斗争、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时，祥生老板就故意叫外国司机去出车。

祥生汽車公司老板的罪惡發家史，不就是千百个司機的血泪史嗎？

新企业的新風尚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派来了干部，重新整頓祥生汽車公司，并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实行了公私合營，改名为上海市出租汽車公司。从此，工人、司機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政治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領導上对工人、司機各方面都很关心。每年到夏天，早已准备好的凉席、竹榻都已安放在各停車站和公司大礼堂內，好让司機同志安靜休息。科室干部还到停車站为司機送毛巾、送消暑的清涼飲料。为了方便做半夜班和路远的司機能睡足歇好，还設有单人宿舍十多处。在党的教育下，司機的政治觉悟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决心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在司機中涌現了很多的新人新事。热情主动、体貼乘客、扶老抱幼、搶救病伤、帮助乘客寻亲找友、帮助乘客解决困难，在司機中已形成風气，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贊揚。

“走投无路落油車”

王才根

我們平湖榨油厂的前身泰源油坊，是在一九三八年开办的。在旧社会的十一年里，这个油厂虽然一再更換厂名，資本家也調換了好几次，但是我們工人，却在苦水里整整淹了十一年，受尽了反动派、資本家和把头的重重压迫和剝削。

俗話說：“走投无路落油車”。在旧社会里，我們榨油工人大都是受反动派和地主压迫、剝削，无处存身而逃出来的外地农民。拿現在我們厂的木榨車間来讲，三十五个人里面，就有二十三人是旧社会被迫离家的农民。我自己，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塘栖許容順嫁妝店解雇出来，无处安身，才跟一个木匠来到平湖做工的。

油坊——人間地獄

解放前的油坊是什麼樣子？幾間矮房子作工場，十幾部原始式人力敲車，兩隻炒菜籽用的“毛鍋”，和幾十個三、四十斤重的石錘頭。我們工人就在這樣一個活地獄里干活！

資本家眼里只曉得撈鈔票，哪管工人死活。他們規定每個榨油工每天要打九車油，勞動時間要十三、四個鐘頭。榨油要拼體力。我們舉起四十斤左右的石錘頭，每榨一車油，就要打五百幾十下，一天下來，一個人等於舉重二十萬斤。這樣笨重的勞動，换来的却僅僅是榨一車油一升米的賣命錢（以米結算工錢，還是鬥爭得來的）。

榨油工人的夏天，真是熱上加熱。工場溫度經常有一百多度，我們熱得汗流浹背，沒辦法，只得脫光衣服，光着身子打油。炒菜籽時，我們要緊貼在一百四十多度高溫的“毛鍋”邊操作，“背毛鍋”（中暑）的每天發生。這真是在拼着命干活啊！到了晚上，矮腳樓上熱得像蒸籠，蚊子、臭蟲好像幫着資本家欺侮工人。沒辦法，我們只得卷上僅有的一條破草蓆，睡到橋上，睡到沿河灘廊棚下。

榨油工人的冬天，又是雪上加霜。資本家根本沒有任何保暖設備，西北風拼命鑽進矮腳樓，吹得我們蜷在稻草里索索抖。我們多數人沒有棉衣，冬至一過，就只得躲在工場里避冬。

貧窮的生活，連自身也难保，哪里還敢討家小。所以我們榨油工人在舊社會里絕大部分是“單身漢”，只有解放後，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徹底翻了身，我們榨油工人才有條件成家。

榨油工人的“三怕”

舊社會里，我們榨油工人有“三怕”。這三怕，就像三把刀子，架在我們頭頸上。

一怕解雇。

資本家解雇我們，恰如家常便飯。小滿、立秋、年底三個節氣，是“明文規定”的解雇工人的三個關口，我們工人碰到這三個節氣，總是提心吊膽，如臨大禍。因為在這幾個節氣里，資本家要大批解雇工人。資本家為啥要揀這三個節氣呢？因為小滿以後是榨油旺季，資本家要把那些年老體弱的工人踢開，好招一批年輕力壯的小伙子進來；立秋和年底，是“火汛”（旺季）過後，資本家已飽吸了我們工人

的血汗，裝滿了腰包，接下去就要轉入淡季，“油水”不大，便把工人大批解雇；等到下一個“火汛”時，再招進工人來搶“火場”。

除了這三個關口，我們還要擔心被“揩書板”。這“揩書板”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跨進工場間，有一塊長方形的書板，上面寫着我們工人“殘缺不全”的名字。要是書板上誰的名字被揩掉了，那就是說，他已遭到無理解雇，就得馬上離開油坊。究竟為什麼要被“揩書板”？也許永遠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有一次，把头為了安插他的一個親戚，就無緣無故地把我除名。又有一次，工人金福林因家中有事，請假回家一趟。這一天，資本家沈肖梅到工場里一轉，發現金福林不在，就在手指頭上吐了點唾液，伸手到書板上把金福林的名字揩掉了。

前面說過，“書板”上寫着的工人的名字，都是“殘缺不全”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也是資本家別有用心。資本家有意把每個工人的名字少寫一個字，例如“書板”上有個叫“陳和”的工人，他的真實姓名應該是陳朋和。一九四八年，陳朋和生了急病，老板死活不管，把他推

出門外。結果陳朋和沒能到家，就死在海寧硤石的一個小棧房里，家屬根本不曉得。就是曉得了，趕來質問也沒有用，因為資本家會說，廠里並沒有陳朋和這個人，只有一個“陳和”。

我們工人被資本家無理解雇後，只得懷着滿腔憤恨，背起唯一的“家當”——一只油蒲包、兩把“行籬刀”，去跑碼頭兜生意。我在舊社會里干了十三年活，在杭嘉湖和江蘇省一帶跑過十九個碼頭。我們廠的老工人龐阿土，在舊社會里干了二十五年活，跑過了江浙兩省三十一個碼頭。有的工人在跑碼頭中，飢寒交迫，貧病交加，死在他鄉。記得一個跑碼頭的蕭山人，到平湖來找工作，結果工作沒找着，就病死在油坊的毛灰間里。

二怕生病。

俗語說：“英雄只怕病來磨”。

在舊社會里，我們榨油工人生了病，根本無錢求醫，連躺在鋪上養病的權利也被剝奪。資本家和工頭經常逼着我們帶病上工，真不知屈死了多少人！二十多歲、身強力壯的小伙子計阿六被活活逼死，至今我還恨滿胸膛。

計阿六是個助榨工，每天要幫助三個榨油工打

二十七車油，每車得用三四十斤重的石榔頭打四百多下，他一天要打一萬多下。在這樣一個人吃人的舊社會里，經年累月的折磨，哪怕身體再強壯些，也會累得躺下來。一九四七年夏天，計阿六終於病了，躺在鋪上呻吟着。病了幾天，把頭陶金仙“光臨”了。他看了看計阿六一眨一眨的眼睛，竟然要逼他上工。計阿六有氣無力地說：“頭腦師傅，我病得這個樣子，實在做不動，……”誰知萬惡的把頭竟說：“你眼睛會眨，嘴巴會開，就得上工！”計阿六被把頭逼着去上工。他一車油沒有打完，就倒在地上。我們忙把他扶到鋪上，可是已經不行了，他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好端端的一個小伙子，就這樣被殺人不見血的魔鬼逼死了。十幾年里，像這樣被逼死去的人，我親眼看到的就有鄔掌夫、賴有寶、朱友發等九人。

我們榨油工人生了病，還要被解雇。一九四二年，我生了一場病，躺倒三個月，藥不沾嘴，虧得階級兄弟送茶送水，总算死里逃生。可是病剛好，把頭就來傳我，獰笑着說：“你另外去找事吧，這里用你不着！”恨得我咬着牙，走出了油坊。找不到事，生活沒着落，我把僅有的一條破被頭，先賣掉了夾

里，又卖掉了被面，带着一条硬糊糊的被絮，流浪在长安一带车站做挑夫。风里来，雨里去，我的脚就此成了疾。

三怕年纪老。

我们榨油工人有句话，叫“少年油车老郎中”。当医生是年纪大的好，当榨油工人，却是年纪越大越倒霉。四十岁开外，也就是我们榨油工人苦老的开始；气力没有了，人也干瘪了，资本家眼看再不能在我們身上捞到油水，就“推出山门不管野和尚”。

有个叫高小友的榨油工，在年轻的时候，资本家见他气力大，油水多，把他当作一块肥肉。但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吸干了他的血，就在他五十岁那年，说他气力小，油榨得少，把他解雇了。资本家还怕他多吃一顿闲饭，竟叫把头将他押出油坊门。高小友被解雇后，不到一个月就悲惨地死去了。

有个工人叫施小桂，资本家留他在坊里“守夜”（晚上管门）。因为他年纪大了，有一天，他从扶梯上跌了下来，跌断了脚，狠心的资本家理也不理，因此伤势愈来愈重，脚烂得见了骨头，后来就烂死在柴堆里。最后，还是我们工人凑弄些钱来把他葬掉。

重重的剝削

資本家的剝削手段，真是詭計多端，花樣百出。那時規定工人每天打足九車油，才能照每車一升米的工錢計算；如果你身體頂不住，做不滿九車，那麼每車油的工資就只能算六合米。資本家還美其名曰“加牌”，實際上却是有扣無加。等到向資本家結算工錢時，花樣又來了：如果工人要拿米，只能拿“青天米”，這是一種不成熟的次米，比一般米只能打個七折；如果要結價，那也只能按《力報》（反動派辦的一張縣報）牌價結算。當時物價一天數跳，說是照牌價，實際上反動報紙上登的是頭一天米市的收盤價，等我們拿到手，早已七折八扣了。我們拿到工錢後，資本家又裝出一副關心相，說：“現在物價飛漲，放鈔票要吃虧的，還是買幾斤油好。”那時，我們干一天活，資本家按零售價，賣給我們半斤油。等我們積滿了十斤油，想賣掉它，可是手裡只有幾張菜油本票（是資本家自己印的票證），不能拿到外面去賣，又只好照批發價賣給資本家；這樣又來了個九折。

我們不但受盡資本家的剝削，還要受把頭的索

礼、吃“过帳”、克扣菜金、硬借錢等等剝削。把头平时的紅白喜事，逢年过节，工人都要“孝敬”，送不起礼，也得借债来送。当时，我們工人中受剝削最重的要算童工。他們每天干着拉風箱、燒火、挑水等重活，工作時間要十五、六个小时，可是得来的工錢却全部被把头吞掉，只能吃到一些飯。这种吃飯无工錢的活，一直要干到十六、七岁。童工曹春法就是由于十来岁正在长身体的时期就干重活，受到了摧殘，直到現在他的背还駝得很厉害。

資本家还投机倒把，殘酷剝削农民。春花登場时，他們以一石米向农民換进两石菜籽；秋收后，又用一担菜油向农民換进六石米（当时是三石菜籽榨一担多油）。这样一年两換，連本帶利可达四倍。

团結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九四〇年，当时的資本家李景淮、吳振玉要詭計改招牌，集体解雇工人。我們同資本家开展了斗争。一个酷热的夏天，天蒙蒙亮，我們手挽着手，堵住大門，不让資本家进出貨物。

資本家看我們团結一致，絲毫沒有退让，到第六天，就去請示“太上皇”日本鬼子。鬼子一听工

人不让“皇軍”有股份的振源公司開門，那還了得！就帶了一個翻譯，荷槍實彈，跟着資本家吳振玉，來到工廠帳房間。我們拼着性命，圍在帳房門口，要求發解雇費，并推工人朱友根為代表，進去交涉。由于我們工人團結一致的斗爭，迫使老板答應每人“預借”三千元偽幣，原班人馬復工。這次斗爭，鍛煉了全廠職工。

一九四四年，物價像斷了綫的气球，下午算的工錢，第二天上午只能買到一包泰山牌香烟。工人李長明拿了兩天工錢，上街買小菜，兩天的血汗錢，只買到一斤旁皮魚、一把太湖蘿卜。大家气得眼睛里要冒出火來。正好桐鄉濮院油車工人發起了罷工，我們得悉后，組織了所有工人，帶着干糧，奔赴嘉興。各地榨油工人罷工大軍會師嘉興。經過了四、五天的齊心斗爭，資本家被迫同意工錢一律跟嘉興一樣：每車油一升米工錢，外加每天一升二合米菜金。這次罷工斗爭的勝利，又一次鍛煉了我廠職工。

黨和毛主席是我們的救星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軍的紅旗，插到了我們平湖。從此我們榨油工人結束了苦難的歲月，翻

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我們和“五毒”俱全的不法資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还领导我們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斗倒了万恶的把头陶金仙，逮捕了破坏生产的反革命分子束玉生。通过尖锐的阶级斗争，我們的眼睛更亮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

我們工人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主人翁责任感，进行了忘我的劳动。大家都以豪迈的革命气魄和无穷的智慧，改造旧设备，先后改成了炒籽机、自动落屑器等十九项革新，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一九五八年以后，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們油厂的面貌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落后的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化生产。榨油工人从此再也不必像解放前那样，从事十分笨重的体力劳动了。近几年来，我們厂又建成了化学处理的浸出车间，进一步改善了劳动条件。

过去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榨油工人，现在当了国家的主人。許多工人在党的培养下担任了领导工作，有的还被选为人民代表。过去是怕跑码头、怕生病、怕老，现在是工作有保障，生病享受

劳动保险，年老就退休，欢度愉快的晚年生活。过去我们榨油工人都是一字不识的大文盲，解放以来，通过业余学习的道路，有的已能看报、写信；在党的培养下，榨油工人还第一次进入了大学。

我们榨油工人真是：想想过去，只有仇恨和痛苦；看看现在，感到幸福和自豪。

（艾纪华 记）

刻 骨 ， 仇

陈 福 生

資 本 家 毒 設 牢 籠 計

我老家原住在湖南湘乡田家冲。在旧社会，家里穷，地主逼得又狠，无奈，全家飘泊到湘潭。

到湘潭后，我住在刘家湾，和街邻罗四伯到李兴记翻砂厂当普通工。那家翻砂厂在河东扁担街，当时是湘潭的一家大翻砂厂，雇着七十多个工人。老板李永松有四十岁年纪，瘦长个子，一张干瘪的脸上镶着一对滚圆的眼睛，人们都叫他“李猴子”。他什么花招都要得出来，比狼心还毒。他有个堂侄，名叫李桂芝，是刘家湾的伪保长，和他的像貌相似，也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这一对凶狠，不知吸吮了多少人的血汗，残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活儿虽说累人，但总算找到了一个饭碗。

一九三八年，我进厂后的第四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伪保长李桂芝带着乡丁挨家挨户抓壮丁。名为抗日，实际是借此敲詐勒索。刘家灣一带也被弄得烏烟瘴气，鸡犬不宁，青壮年只好到处逃避。我們穷工人再也不敢回家了。

哪知躲过这一灾，又有另一难。事过一个月，老板发工錢了，发給我們的不是光洋，都是一色的“法币”。我顿时一惊，老板为什么給我們这样的錢呢？这种票子常“跌水”，隔夜一块錢就要貶值許多。我和一伙工友一齐跑去找李老板，大伙儿圍着他說：“我們讲的都是銀洋，这种錢我們不要。”半天，李老板才从虎皮躺椅上豎起来，扫了我們一眼，奸笑道：“哈哈……弟兄們要銀洋嘛，这个实在难办，时局一紧，銀洋都入了庫，只有法币流通，我姓李的不是故意亏待你們罗！”打这以后，每个月发工錢都是以二十块銀洋折成四十块法币計算的。我們領到四十块法币到市場上去，只能兌回八块銀洋。后来我发现老板进货銷貨都是用的銀洋，为什么給我們的工錢又是法币呢？經過打听，才知道原来老板用銀洋到市場上去兌換法币，一块銀洋換五块法币；而折給工人，却一块銀洋只給两块法币，

他从中賺了一半多。

我把这事告诉了罗四伯。他气愤地说：“这家伙恶毒得很，明明是克扣我们的工价，还说没亏待我们。我看，我们让他伤点老本，做个他急我不急——磨洋工！”经过罗四伯一串连，工友们都暗暗地行动，鑄的“活”由每天五六炉铁水降低到四五炉了。李猴子见苗头不对，便整天跟着工人的屁股转，想卡死我们。可是不管他怎样监视，产量依旧天天下降。李猴子见这一招不顶事，便施展了另一个阴谋手段。一天快下工的时候，李猴子来到工场，对我们说：“下工后，请大家到賬房里去結賬。”我不由得心里怀疑起来：还不到发工钱的时候，結什么賬呢？挨到下工，大伙儿跑到賬房。这时李猴子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装着要哭的脸，见了我们便站起来，踱着方步子，一双手反剪到背后。他踱了几步才抬起头来说：“弟兄们，我的生意现在亏了大本，想暂时歇一歇，請諸位另行高就，日后倘有起发，再接諸位来帮忙。”不等我们回话，他又把眼睛向那个胖子管賬一瞥：“給他們結賬哇！”胖子打了一阵算盘，然后给了我们每个人二十块法币。我们这些穷苦工友就这样被解雇了。

我和一些工友剛回到刘家灣，伪保长李桂芝便坐到工友家里逼壮丁費，弄得我和罗四伯和别的工友都不敢回家。有一天，我們見到了李猴子，他表示工厂可以复工讓我們回厂，他假惺惺地說：“我姓李的一貫是‘同舟共济’的，只要諸位包我的生意不亏本，我願和大家分一口飯吃，哈哈……”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們只好忍气吞声，又給他当牛当馬的干下去。

后来我們才知道这是李猴子事先設好的圈套，他假意关闭工厂，讓我們回家，却又暗中指使李桂芝到我們家中逼丁、逼費，使我們有翅难展，不得不給他当奴隶。

穷工友怒打恶把头

一九四四年，李兴記翻砂厂的生意趁着国难日益兴盛起来。老板李猴子利用誘騙、訛詐的手段，又招来了五十多个从异乡逃来的难民。李猴子的侄儿李桂芝当了把头。

李桂芝是穷人的死对头，大家都咬牙切齒地痛恨他，恨不得把这个家伙扔到化铁炉里燒死。哎，那个年月是他們的天下，虽有刻骨仇恨也不能輕易

下手啊！罗四伯怕我闖出禍来，常常劝我：“暂时忍着这口气吧，我們慢慢想办法来对付这些家伙。”

李桂芝到了李兴記翻砂厂后，专干坏事。他为主子效劳真是腿勤眼勤，整天跟着我們的屁股轉，一点也不放松，累得我們喘不过气来。过去是白天开炉，李桂芝当了把头，把开炉的时间放在晚上，白天打箱、做杂工，延长了劳动时间，增加了劳动强度。

这时，我已經有两个孩子，大妹崽六岁，小妹崽一岁，家住在翻砂厂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我每月的工錢，只能供他們糊半月的口。妻子沒法生活，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去沿門乞討。每当我深更半夜干完活回来，一岁的妹崽总是餓得哇哇地哭，瘦弱的妻子沒有奶汁給孩子吃，孩子就这样餓死了。

好容易盼到发工錢了，李桂芝把我們刘家灣的十几个穷工友喊攏去。李猴子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捧着黃銅水烟袋在慢慢地抽着，見了我們，他干瘦的臉上現出了阴笑：“弟兄們，請坐！”我心里想：老板为什么单单喊我們刘家灣的十几个工友呢？这里面一定有蹊蹺。

“大家坐吧，都是乡亲，随便点嘛！”李猴子又客气地說。我滿肚子的气忍不住了，便問道：“有

什么事？就請讲吧。”

“哦！莫慌嘛，哈哈……”李猴子打了几声哈哈，离开了太师椅，反剪着双手，弓着背，慢慢地踱着：“跟大家商量件事，說句知心話，时局不好，我的生意眼下又做不成了，想請弟兄們給我帮个忙，工錢的事，暂时减一点，日后生意兴旺，再增补弟兄們的工錢。”他說到这里把眼睛向李桂芝一瞟，把头会意地点了一下头，走到賬房門口，恶声恶气地說：“給刘家灣的弟兄們提前发工錢呀！”那肥胖子管賬，打定算盘，仰着肥脑袋，头一声就叫着我的名字：“陈福生領工錢。”我走攏去接过錢来一数，只有三十块法币，顿时一惊：“怎么一次减了十块？”肥胖子管賬皮笑肉不笑地說：“这就算不錯了，三十块錢可以雇两个难民咧，乖乖地拿去干活吧！”

原来李桂芝已买通了难民收容所的負責人，大肆貶低工价，榨取他們的血汗。他知道我們刘家灣的工友不好惹，就借口生意亏本来詐騙我們，并用难民的工价进行威胁，想叫我們服服貼貼地为他干下去。

時間又过去了三个月，端午节到了。这天大清

早，李桂芝来到工房：“罗老侑子，我家老爷請你們刘家灣的工友打个‘牙祭’，下午来呀！”李桂芝洋洋自得地說完走了。罗四伯对我說：“看这家伙今天又使什么坏主意。”

下午，我們刘家灣的十几个工友一起来到李猴子家里。真神气呀！堂屋里摆了两張八仙桌，滿桌菜肴，冒着香噴噴的热气。李猴子假惺惺地笑臉相迎，李桂芝在一旁滿口奉承：“我家老爷真是仁义道德，多够朋友，嘿嘿嘿……来！自己人莫客气。”

我們散坐一旁。李猴子坐在太师椅上，翹着二郎腿，口里衔着水烟袋慢慢地抽着。他吐了几口烟圈，望着我們獰笑了一下：“請諸位来，一則欢度佳节，二則也有个事和弟兄們商量商量。”他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弓着梳子背，慢慢踱到我們面前：

“产品銷路不好得很，哎！生意又亏了大本。工錢的事，还要請諸位让一点……。”我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便气冲冲地搶过来说：“你的生意亏什么本？上个月生产的袜机座，你就卖了五千块銀洋。这出戏不要唱了吧！”我这一頂，竟使李猴子張口結舌，恼羞成怒了：“你……你这是瞎說。”罗四伯也站起来补了一句：“那么多的袜机座到哪里去

了？”大伙也跟着闹了起来。李桂芝见真相毕露，便急忙帮腔说：“干不干由你们，工钱还要减十块。”

李猴子仍旧奸笑道：“还是好好地去做事吧，不是我这个老板，你们到哪里找得到一口饭吃哟！”

我心里一想：再减就只剩下二十块法币了，还不够她们母女十天的生活。我越想越气愤，看到李桂芝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家伙，旧仇新恨交织在一起，一股怒潮从我的心底猛然涌上来：“李桂芝，老子不给你们当奴隶了。”我蓦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好哇！你倒有胆量，不识抬举的东西，给我滚！”李桂芝冲着我吼道。

这时我愤怒地捏紧铁一般的拳头，猛地击过去，一拳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他满口的血喷了出来，像一条恶狗一样地猛跳着，吼叫着。

李猴子也跟着跳了起来，要拿我去见官府。罗四伯和一伙工友一齐来护着我，我便趁机逃出了虎窝。

跑到家里已是掌灯时分，孩子的妈见我这般情景，吓得惊叫起来：“哎呀！你这是怎么啦？”

“赶快走啊！”我来不及细说，一边喊着孩子的

媽，一邊卷着床上的一床爛被子。妹崽吓得哇哇地哭，妻子一時呆了，站在地上不動。我心想：偽鄉長是李桂芝的拜把兄弟，今晚不逃，明天就逃不脫了。便回頭對妻子說：“我闖了大禍，揍了狗日的李桂芝！”她抱着妹崽，我背着一個大滾包，趁着茫茫黑夜逃出了家門。還沒走上半里路，便聽到背後犬聲汪汪地嚎叫，人聲吶喊。我低聲對妻子說：“她媽，我們往背巷里躲。”

我緊拉着孩子的媽媽往一條窄巷里走。三腳兩步穿過巷道，忽見拐彎處小茅棚里射出一絲微弱的燈光。我們急忙奔到門口，從門縫往里一望，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娘坐在昏黃的油燈下面補衣服。我喊了一聲：“老大娘，請您開門。”我這一喊，讓她吃了一驚，慌忙地抬起頭。“老大娘，救人啊！”孩子的媽媽又喊了一聲。老大娘端着油燈摸到門邊，把門閂拉開，我們趕忙跨了進去。“老大娘，請您救救我們，李桂芝帶人來抓我們了。”妻子說。

“哎！這是什麼世道啊！”老大娘驚慌地打量着我們，又掃了一眼窄小的房子：“來！你們趕快躲在我的床後面。”她把一張破櫃子移開，我們從櫃旁擠了過去躲在床後面。老大娘又把櫃子移回原

地，熄了灯，睡在床上。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又听到砰砰砰的击门声。“老爷们，我这里没有什么呀！”隔壁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走！到隔壁茅棚里去。”我一听这正是李桂芝的声音。原来他们在挨门挨户地搜查，看来这家伙要下毒手了。

“开门！”砰砰砰……

老大娘起床点亮了油灯，打开大门。一伙凶煞像潮水一般地涌了进来。妻子把妹崽抱在怀里侧卧在地上。我蹲在壁角，握紧拳头，只隔一层蚊帐，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们，准备必要时和他们拼了。十几个持枪的乡丁满屋里乱转。李桂芝拄着一根棍子，头上捆了一条白纱布，他用手捂着嘴，两只恶眼瞪着老大娘，狠狠地說：“你家来了什么人没有？”

“老爷，你这是从哪里说起？我是个孤老，独崽当壮丁死在外面了。”

其中一个乡狗子說：“老爷，我看莫耽误时间了，快去追吧！这一点小茅棚，藏不住人的。”“好哇！看你陈福生小子往哪里逃！让老子抓住，不剥你皮、抽你筋，就不算人！”他把手中的棍子往空中一扬，对乡狗子命令道：“走！往北头巷口追！”

这群恶煞一阵风似地冲了出去。老大娘走到門外面探望了一会儿，跑回来低声喚我們：“他們往北走了，你們赶快逃吧。”我和孩子媽走了出来，拉着老大娘的手說：“老大娘，你貴姓？多亏您救了我們全家。”

“快走吧，孩子！我姓胡，都是穷苦人哪。”老大娘眼泪汪汪地說。

我們告辞了这位老大娘，往南头的巷口走去。这时已是过半夜了。我拉着孩子的媽，連夜摸出湘潭，直奔荒郊。

粉碎資本家的进攻

我們从湘潭逃出，一直逃到衡阳。我在衡阳又找到了一家翻砂厂做工。到这里还没有干上一年，因为我的脚給铁水燙伤，被資本家开除了。燙伤的脚沒錢医治，伤处日益潰烂，眼看沒有一条生路，只好沿門乞討。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帶着妻女逃回湘潭郊区，仍旧討飯度日。潰烂的脚，由于妻子想了些土办法才慢慢地治好了。

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家屋檐脚下安歇，睡到半夜时分，忽然听到屋后的大道上，响着整齐的脚步

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这时，我也听说过一点解放战争的消息，便悄悄地摸到屋旁一棵大柳树下，借着朦胧的月色看过去。哎呀！是过兵！我不由得一阵心跳，暗想：这是解放军吗？哪里来的这样快？是蒋匪军吗？不对！那帮家伙没有这样严肃整齐。瞧，过这么多的兵连狗都不叫一声啊！我看着浩荡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如同神兵一般。这时皎洁的月亮正从云堆里钻了出来，照得林子外面一片明亮。我的眼睛豁然明朗了，清楚地看到他们帽沿上的五角星。“好呀！”我高兴得几乎喊了起来，但又怕惊动队伍的行程，竭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我悄悄地从树旁转了过来，飞也似地跑回屋檐脚下，情不自禁地推醒了妻子：“她妈，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孩子的妈妈忽然惊醒，揉着眼睛坐起来，聆听了一下，说：“像是过兵？”

我说：“是的。解放军、共产党来啦！”孩子的妈妈顿时满脸笑开了花。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笑脸，我也跟着笑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奔到湘潭街上，街道大变样啦！墙壁上都是贴的五颜六色的“欢迎解放军”和“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满街都是解放军。他们个

个精神振作，笑容可掬。欢迎解放军的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震撼着城市，震撼着原野。

市面上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們也被安置好了：我的妻子被安置在解放军被服厂工作，还当上了居民委员会的组长咧！大妹崽上了学。我又回到李兴記翻砂厂。这时老板表面上也改变了态度。可惜的是狗日的伪保长李桂芝，在我逃走以后，不久便得病死了。这倒便宜了他。

一九五二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反对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一天晚上，工作队的屈同志到了我的家里，亲切地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打这以后，我渐渐地明白了过去受苦受难的根源。

一天，我从市政府学习回来，看到李猴子这个家伙变得“和蔼”了，对人的态度显得特别“客气”，还很“关心”大家的生活。工友们的伙食也突然好了起来。看到这种新鲜事儿，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我把这件事情向工作队的屈同志讲了。屈同志严肃地对我说：“福生同志，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

来。要当心啊！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糖衣炮弹！我们要发动群众，向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我听了他的话，心明眼亮，好像又懂得了很多道理。不久，工作队又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通过积极分子的活动，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意志。大家纷纷起来向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工人们的坚强团结，粉碎了资本家的进攻。李猴子的糖衣炮弹失灵了，他的威风也抖不起来了。

我现在满五十一岁了。人们都说我越活越年青了。可不是吗？我真的返老还童了咧！在大跃进中，我是全厂的先进生产者之一，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培养下，现在我成了七级技术工人了。我的大妹崽是师专毕业生。二仔崽读到初中毕业，便参加了祖国的工业建设。还有一个细妹崽和一个仔崽也都上了学。一家人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一家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

我的这本仇恨史，除了自己永世不会忘记外，还常常讲给我的仔崽们听哩！记得今年在株州工作的大妹崽，暑假回家看望我，谈起家常的时候，又

扯到了过去。大妹崽蹙着眉头，有些厌烦地对我說：“爹，您又翻那本辛酸賬了。”我說：“怎么不翻呢？生活越好越要翻，你們青年人就不知道生活是咋好起来的。”

党拯救了我，拯救了我們一家，拯救了全中国所有的劳苦人民。党，是我們再生的爹娘，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龔道鈞 整理）

地下的奴隶

覺 非

我走进烏魯木齐六道灣煤矿的住宅区，去訪問爱矿工人、放炮手、維族老矿工热衣木·木沙，当他听完了我的话，伸出矿工特有的、带着煤亮的大手，把一盘馬奶子葡萄和一盘甜糕推到我的面前，做了一个請吃的手势，然后习惯地用手背抿了抿他那两撇漂亮的羊角鬍子，說：“哎——同志！我这点事，不值得一提，現在，在咱們这个社会里，哪一个工人不爱厂、爱矿？咱們是国家的主人了嘛！”

“可是，話也得說回来，对主人的体会也是有各式各样的。有人就問过我：‘热衣木·木沙，你老拣那些廢药綫干啥？咱們現在是建設社会主义，还在乎那一丁点！’”

“沒有事的时候，我就常想：我們是主人，可

是应该怎么样当主人呢？我觉得，革命胜利得来的不易，我们当主人得来的也不容易，是经过多少代人的血泪和斗争呀……”

他说着，把脸扭向了窗子，眼睛也慢慢地眯起，视线透过明洁的玻璃，落在远处高高绞车架上的、不断旋转着的绞盘上，久久地凝视着，似乎随着那绞车的旋转，在那里构成了一个思想的焦点与旋轴，把昔日所有陈旧的记忆又重新牵起。

“我离开家乡已经三十来年了！可是却不是我自愿，而是被逼着出来的……”他终于又开口了，但声音却变得十分的愤怒和低沉，宛如大海中的怒潮汹涌，在倾吐着它的不平。

我原是喀什那儿的人。家里很穷，只依靠租种巴依^①家里一点盐碱地生活。可是，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地又薄，再加上还得给巴依家里打杂做活，地里的收成很少，总是去了租税就没有吃喝。因此，一家十来口人时常挨饿。我八岁时，爹就把我送到巴依家抵债，打那时候起，我就给巴依家放羊。

① 巴依，即地主老财。

直到我二十岁那一年，眼看我的弟妹們也长大了，也能干活了，却遇上国民党派壮丁。有錢使得鬼推磨，巴依和拜格^①勾結在一起，把二十六个壮丁都派在了我們穷人家的身上。我爹沒有錢送礼，一个勁儿說好話。拜格却把眼睛瞪的像牛眼珠子一样大，吼道：“住口！要去就好好地去，不去就拿繩子綁了去！”我气的扶住我爹說：“爹，你犯不着跟他費唾沫，我去！”

他們把我們这二十六个人，在县里关了八天，第九天放出来，由一个国民党軍官押着叫我們赶着毛驴到烏魯木齐去送麦子。喀什离烏魯木齐有几千里，当中又隔着很多干旱的戈壁滩，不用說餓，就是渴也能把人活活的渴死，所以大家心里很难过，但是有国民党押着又不能不去。

我們从二月到十一月，受尽了千辛万苦，走了九个月，总算是到了烏魯木齐。誰知，在这里还有更大的灾难等待着我們。万沒有想到，那个被狼吃去心肝的国民党軍官，竟然把粮食全部私吞了，帶上一个烂女人，丢下我們就逃跑了。我們这些

① 拜格，国民党的伪保长。

人，在烏魯木齊都是舉目無親，又到了十冬臘月，要吃沒有吃，要穿沒有穿，就這樣流落在街頭。有時找到短工就做做，沒有只好討飯。以後，我在老滿城找到個打圍牆的幫工干，可是由於身上穿的單薄，雖然在干活，仍然冷的發抖。有一個漢族工友，看我還穿着單衣，就說：“老鄉呵，眼看這天氣越來越冷了，你這一身衣服可熬不過冬呵！”

我說：“在這兒沒親沒故，有啥法子！”

“唉！那倒是。哎！”他忽然想起來說：“你到八道灣下煤窯去吧，在窯底下暖和一些。”我聽從了他的話，到了八道灣一家小窯上，當了“吭七”^①。從此，我就從地上的奴隸又變成了地下的奴隸。

在那年月，下煤窯當礦工，跟現在比可是天地之差。那些窯主，眼睛里看的只有嘩嘩響的大洋錢，我們工人在他們眼睛里，連一頭牲口都不如。他就知道叫你挖煤，別的全不管，更不用說什麼勞保了。

我到了窯上，半夜里老板叫我把衣服扒光，給了我一塊破毡墊圍在腰里，又遞給我一個油葫蘆，叫我點着了下窯去背煤。我順着繩梯爬下去一看，吓

① 吭七，下煤窯的工人。

了我一身冷汗。这哪儿是人做活的地方，简直是个活地狱。几百米长的运输巷道黑洞洞，里面全是煤末子（那时老板只要块煤，不要煤末），到处坑坑洼洼，又低又窄又闷气；工作面只是一个几米的大黑洞，连一根密柱也没支。背煤工都是赤条条地在腰里围着一块垫子，背上驮着个一百多斤重的煤筐，一只手扶着筐，另一只手还得端着个油葫芦照亮，说爬不是爬，说走不是走，累的“吭哧吭哧”的喘气，就这样，后边还跟着个工头，拎着根棒子直吆喝。

他们也给我装好了煤，放在背上，我这才明白大家为啥那样走。因为巷道太低，高了碰头，低了又要跌跤。在巷道里就是空着手走还感到很费劲，何况还背着煤筐！我喘着大气拼命跟上大家，到了井口倒掉煤，一摸腰背，由于煤渣串到垫子下面，再经煤一压，皮肉都已经轧烂了，粘糊糊摸了一把血，痛得我要命。老工人跟我說：“小伙子！你得悠着点劲干呐，咱们犯不着为黑心的老板卖命，时间还长着哩！”果真是那样，我肚子饿了几次，才熬到下工。可是上了井一看，已经又是满天的星星了。

我们吃过饭，我满以为这回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但没等睡上两个钟头，却又被工头叫起来，再

給吃頓飯又下井。長了，我才明白，原來這是老板想出來的多干活省糧食的一個毒法。那時候，雖然說的是計件工資（一百二十筐煤一個定額），可是，誰也沒有從窑上拿走过錢。平時，他不給你算賬，到春天歇工的時候（春夏煤賣不出去的時候，就停工），你讓他給你結賬拿錢，他却把眼珠子一翻，說：“你們挖的是煤，不是錢。要錢沒有，給你們一人合三十筐煤。”我的天，那時天氣已經暖了，道又泥濘，還有誰到這山溝子裡來買煤？這時，那狠毒的老板，看見大家發愁，就抄着手再嘿嘿地奸笑着湊過來，說：“我看你們也實在為難，這樣吧，你們把煤放在這兒，我給你們代賣；不然，就按半價合給我，嘿嘿，雖然我也困難，可總比你們肩膀要寬的多，担得住。”看他那一副奸狡樣子，把我們氣的肺痛，有時恨極了，干脆把煤堆起來，放一把火燒掉，就是不低價賣給他；然後就到農村去找零活做。可是，因為沒有錢，衣服單，到冬天還是得回來下窑，就像賣給那兒一樣。那時，在我們吭七裡面流傳着這樣一首歌：

烏魯木齊的窮人多半都在煤窑，

靴子和衣物都变成了当票，
整天呆在坑下想走也走不掉，
几枚铜板就像把我的命卖了。

这首歌說的一点也不假，只要你走进煤窑的門，就只有躺着(死掉)才能出去。一年之中事故无数，死伤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有一天，我們四个背煤工，剛走进一个工作面里去装煤，忽然轰隆一声，头顶上的石头塌了下来。等烟尘散了，点上油葫芦一看，两个伙伴被埋在石头里，一个伙伴的腿被砸断了。我們把那两个伙伴扒出来时，他們的身子血肉模糊，脑袋已經碎了。大家难过的都掉了眼泪，可是老板来了，第一句話却問：“压住多少工具？”我們气的說：“你怎么不看看人？”結果他連一块布都沒有給(維族是用布包尸)，我們都恨透了这个烂心肝的家伙！

那时候，我們一天干二十来个小时的活，吃的只有两頓高粱或者麸皮饅，住的是破泥巴屋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風，在湿地上鋪一点草就是床，一头垫点煤灰就算是枕头。就連这样的破屋子，有了病不能上工时，还不許在里边住。有一年，我得了瘡

疾病，瘦得皮包骨头，浑身軟的不能动。老板不仅不給我治，反而在我病危的时候，停了我的伙。工友們去质問他：“他是給你干活的，你为什么不给飯？”他把手一背，臉一揚，冷冷地說：“干活給，不干活就不給。”他不給我飯吃还不算，这个披着人皮的狼，趁着工友們下井的机会，叫工头們硬把我从屋子里扔出去了，說：“你要死就死在外边吧！”

工友們下工以后，在外面煤灰里发现了我，就把我搭在一个土窖里，每天上班的时候，給我放一土碗水，掰下半块饅。但是，我虛弱地連土碗也端不起；要解手只好慢慢地往外爬，晕过去，醒过来，醒过来再晕过去，当我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正是滿天星月。我伸出手看了看，只剩了一层薄皮几根骨头，不由的想起了我的家，想起我媽媽在我临走时候喊的話。我难过地說：“媽媽！我再也回不去了！”可是我又一想，有工友們的照顾，也許我还能慢慢好起来？这时候，我想起在煤窑受的老板的剝削和压迫，想起那天我还没断气这恶狼就把我扔出来，我在心里恨恨地說：“我要是还能活着，一定不饒你这恶狼！”……

“哼！”他咬咬牙，抑制住悲憤，接着說：“万沒有想到，干了十四年的吭七，竟然熬到了解放，旧社会把我变成奴隶，打入地獄；共产党，毛主席領導我們打倒了剝削階級，推翻了旧社会，成为国家的主人。

“記得，剛解放的时候，有一位領導同志来給我們工人講話說：‘工人同志們！咱們解放了，成为国家的主人了！……’我当时听了，激动得哭起来。沒有吃过苦中苦，不知道甜上甜。在旧社会我們挨打受罵，当牛当馬，不就因为我們不是主人嗎？这会我們当了主人了，再也沒人敢来压迫我們，剝削我們了。我怎么能不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和这新社会？每次我沒事在家接拣来的廢药綫的时候，心里就充滿了幸福、豪迈的感情……”

濃霧中的歲月

楊桂清

我今年六十四歲，在舊社會，我在被稱為“活棺材”的順昌石粉廠，整整做了二十五年的臨時工。

一九二四年，我二十四歲，進了順昌石粉廠。進廠的第一天，我就聽到工人中流傳着這樣一句話：“石粉廠，殺人廠，一腳踏在棺材里，一腳踏在棺材外。”一聽這話，我的心擰緊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不干石粉工又到哪儿去找飯吃！

那時順昌石粉廠的車間，真是一具“活棺材”。我們干的活，是將石頭磨成粉。石粉從管子里噴出，滿屋粉塵瀰漫，人在其中，像在濃霧中一樣，對面看不見。眼睛失去了作用，我們就像瞎子那樣憑記憶取物干活。車間里伸手不見五指，又沒有口罩，一天不知要吸入多少粉塵。要是磨黑粉，更苦了。

下了班，我們擤出的鼻涕像兩條又粗又長的蚯蚓；吐出的口水全成黑色；渾身上下一片漆黑。磨水泥時，粉塵吸入鼻中，凝結成塊，要想挖出它，非拉下一撮鼻毛不可。磨滑石粉時，車間里更是一片混濁，滿屋飛粉不去說它，還有大量的熱氣從出口管子里噴出。人在里面操作，跟在蒸籠里差不多。

屋里的飛粉本來可以放到室外去，可是狠心的老板為了賺錢，哪管工人的死活。他們說：“粉子不能放掉，飛粉回收，還可以賣錢！”錢！老板的心里就知道錢！錢！我們不少工人却因吸了大量粉塵，得了矽肺病而死去。

那時節，我們石粉工人的身上還緊壓着一條扛棒。肩上吃五六百斤（重的甚至八百斤），如果上不了跳板的話，就別想吃這口飯。

許多吸飽了石粉、壓彎了腰的石粉工人，在這口“活棺材”里倒下了……

石粉工人丁榮坤，進廠時年輕力壯，可是沒幾個月，他就像青草遇寒霜，枯萎了。有一天，他在車間里吐了幾口血，在場的一位工人見了就嚷：“血！”丁榮坤抬起慘白的面孔，痛苦地搖着手說：“輕一點，不要大驚小怪。”說着，他忙撒了一把石粉，將

血盖沒，然后又叮囑大家：不要告訴別人，因为老板知道了要敲掉飯碗的。在当时的順昌石粉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談不上有一个休息日。日夜两班，一班是十小时。很多人一天連續做两班。有的工人还在每天仅有的四个钟头的睡觉時間里，挤出時間去加班。这样繁重的生活，在这种“濃霧”里拼命，就是鋼鑄的人也要垮，更不要說我們这些吃不飽穿不暖的人了。丁荣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的病，病了也不敢休息。有一天，他突然不見了，后来我們四处寻找，結果在工厂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可是，他已經无声无息地死了。在他僵硬的尸体上积着厚厚的一层黑粉，他嘴边的地上，留着一滩变了色的血……

工人韓文俊弟兄三人，都是这样被折磨而死，抛下了孤苦伶仃的老娘。工人張大媽一家，竟有五人葬送在这口“活棺材”里……

死去的，有的連口薄皮棺材也沒有，用草包一卷被抛到厂后門外的荒野里。那时，我們厂后門外的荒野，就是石粉工人的坟場。

当时，我一天的工錢是一升半米(約二斤四两)。干这样的重活，这点錢連买吃的也不够，哪儿談得

上买衣服和鞋子。解放前，我光杆一人，干了二十五年的石粉工，做不起一条棉被，沒一件像样的布衫。在車間里干活，渾身上下沒一絲布片，只用麻袋圍着腰。我終年穿不上一双鞋子。

提起鞋子，我又想起了一段辛酸的事来：腊月里的一天，地上积着厚厚的雪，我还穿着单衫，赤着脚。早晨，工头要我去出貨。我想，赤脚在雪地里走，怎么受得了？我就去找了几块破麻袋把脚裹起来。我同一个工人扛着六百斤重的粉袋，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不几步，雪水浸透了麻袋片，我觉得脚上像有无数針在刺，痛得我冒出汗来。不料工头高燦生来了，他用棒子戳住我的脚，翻着眼叫嚷：“楊桂清，你这像啥？”我瞪着工头身上的皮袍，心里罵道：“別看你穿戴比我好，你的黑心肝狗也不爱吃！”

我暗地里咬着牙想：跳出順昌！跳出这口“活棺材”！可是到哪里去呢？当时天下，到处都同黑粉車間一样漆黑一片。这时，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来。

我原籍河南开封，祖祖輩輩为地主扛活。从我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个討飯的。那时媽媽成天背

着我四乡乞討。我一岁那年，爸爸媽媽等相继死于水灾与疫病，一年之中，一家連死六人，从此我成了孤儿，靠姑母討飯把我喂大。十二岁那年，我当了地主家的小长工。后来，我受不了地主的折磨，逃出地主家，一路討飯来到上海。这时我十六岁。从十六岁到二十四岁这期间，我卖过报，修过馬路，扛过煤炭，背过油桶，拉过黄包車，拾过垃圾，大餅摊上我拉过風箱，老虎灶头我燒过开水。我还跟过一位拉“洋片”的山东老大爷流浪过云南、貴州。睡的是弄堂屋檐下，吃的是山芋皮、干大餅。

想起这一連串的經歷，我不由得又悲又恨：“这鬼世道，真是沒有穷人走的路呵！”

沒法子，明明知道石粉厂是个“杀人厂”，是“活棺材”，只好先干着吧。

有一次，几个工人去要求老板装吸尘設備，老板听了，冷冷的說：“嘿嘿，石粉工人不吃石粉，笑話！装設備，我花不起这个錢！”恨的我們直咬牙！

穷人无路可投，活着进了石粉厂，可是出去的，都是尸体！旧社会的石粉厂，死去的工人无法統計。“我厂子死的人，在阴間也可以开个石粉厂。”这是解放后一个資本家坦白交代的話。解放前的石

粉厂，确确实实是个“杀人厂”，是口“活棺材”。

那时，我也得了病。二十五年当中，我被解雇过十五六次，在車間里日子少，所以病情輕一点。不过我也知道旧社会的穷工人得了这种病，是活不长了。可是人还活着，就还得拼着命干活哪！

正当死亡威胁着我的时候，上海解放了！党的阳光与雨露使我这棵枯木逢了春。我这个二十五年的临时工，终于熬出了头。

党和政府最大限度地关怀我們石粉工人的健康，特地派了医生到厂里給我們檢查身体，定期給我們肺部拍片。国家还花了很大一笔錢，专为我們造了一座疗养院。党派来了医生、护士。我們这些身上有病的工人，住进了疗养院。

石粉工人的梦想实现了：車間里安装上防尘設備。記得一九五五年四月里一天，有人报喜說：“車間里装吸尘器啦！”难道石粉工人想了几十年的事真的一下办到了？我跑去一看，可不是吸尘器呼呼响着，車間里“烟消云散”了。墙上的風扇带来了陣陣凉風。我含着泪，用手撫摸着机器，激动得怎么也說不出話来。

随后，車間里又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紧

紧压在石粉工人肩上几十年的扛棒也丢掉了。同志们，这不是神话，这是现实啊！

我杨柱清的变化更不必说了。我打了大半世光棍，一九五二年，我五十二岁时做了新郎。一九五四年我搬进了曹杨新村。同年，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从一九六一年八月退休到现在，我时常到厂里去。工厂像一块吸铁石似的吸引着我。车间里每一新的变化，都会勾起我对苦难生活的回忆。我时常叮嘱厂里的青年们：“热天，当你们站在喷雾器下喝着盐汽水时，别忘了我们在‘蒸笼’里喝井水的日子；冷天，你们坐在车间休息室火炉旁谈笑时，别忘了我们在雪地里赤脚干活的情景；当你们穿着卡其工作服劳动在运输带旁时，同志们，千万不能忘记上一辈身上围着一麻袋、扛着五六百斤的石粉被工头赶上跳板的苦难呵！”

（金 颢 整理）

笑 面 狼

紀 哲

天下沒有不吃羊的狼，世上沒有不剝削工人的資本家。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手段不僅很毒辣，也很狡猾。有時候，他們像童話里的“狼外婆”，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善人”，用小恩小惠來欺騙工人。為了揭露資本家的這種偽善的面貌，我特地訪問了一位姓何的同志。他給我講了解放前他受資本家的欺騙和剝削的故事。

我十三歲上，爸爸失業了，家里窮得連飯都吃不上。實在沒有法兒了，爸爸只好領我到一家木匠鋪去當學徒，讓我自個兒掙飯吃去。

木匠鋪的宋掌櫃和我家是老鄰居，平時管我爸爸叫三叔。得虧有這點關係，他才“破格”收了我

这个十三岁的童工。

进铺子的头一天，宋掌柜看我又瘦又小，显出为难的样子对我爸爸说：“三叔，你把孩子领回去吧。太小了，当学徒都得十五六岁才行哪。”

是啊！是太小了。今天十三岁的孩子，正是系着红领巾，活蹦乱跳上学的时候。可是在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就得饿死。我爹好说歹说，宋掌柜才把我收下了。说好别人当学徒三年给七十五吊钱，我太小只给七十吊（从前用铜钱，一千个铜钱叫一吊）。可是讲干活，因为我是最小的徒弟，只能多干，不能少干。

学徒学徒，三年为奴。我和师兄弟们天天都是十一点多钟睡觉，三点左右就得起来。做夜工的时候，睡的还要晚。学徒都是些半大孩子，能不困吗？有一天早晨，我们收拾刨花。干着干着困了，就睡在刨花堆里了。宋掌柜早晨起来到处找不到我们，一脚从刨花堆里踢出一堆徒弟。他骂了一句：“跑他妈这儿来睡回龙觉了，给我干活去！”

有一回，我拎着油瓶去打油。走在大街上，看见拐角有个说书的。我想凑上去听听再走，一听就出了神，忘了去打油。冷不防，后边有人狠狠地踢

我一脚，把我吓了一跳。拎瓶子的手一松，油瓶打了个稀烂。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宋掌柜。

那时候，做夜工是干三宿歇一夜。学徒的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熬到这一个歇工的夜晚。可到了这天夜里，柜上就来收拾徒弟了。三天来谁有什么过错，一块儿算总账，重的打板子，轻的罚跪。这天黑夜，我师傅叫我趴在炕沿上，大板子一下接一下地往屁股上打。边打边问：“往后还睡不睡回龙觉了？”“上街还听不听书了？”咬牙切齿地骂我没志气。打完了，骂完了，还让我们排一溜儿跪在鲁班像前。也不知道跪多半天了，可巧一个大师傅来了，他进门的时候没看见黑影里跪着一溜徒弟。一迈进门槛，就让我给絆了一个趔趄。他吃惊地说：

“哎呀！这儿还有人？”

他去找宋掌柜给讲情，宋掌柜嘻皮笑脸地走来“圆场”（就是给调解），让我们给师傅们装烟、倒水、作揖、行礼，算是赔礼道歉，这才完事。这时候，也就折腾到小半夜了。

折腾来折腾去，在我们不懂事的小心眼儿里，恨的是师傅，宋掌柜却似乎比师傅还好。可是，后来我们大了一点才知道，这个铺子有个规矩：干活的时候

不許打徒弟，免得耽誤活。但是只要掌柜的跟師傅說一聲哪個徒弟該管教，師傅必須在歇工的夜晚打他，誰要是不打就是違犯鋪規。是啊！掌柜的不告訴，師傅怎麼會知道我睡過回龍覺、聽過書？有人替他打，他還親自勞神費力干啥？我這才初步認識了掌柜的真面目。怪不得師傅每回打我，他都好像自己挨打一樣，難過的幾天也變不過臉色來。

唉！不管怎麼的，將就學下去吧，好在三年快熬到頭了。

三年滿了，我去找宋掌柜，請求讓我出徒。他說：“出徒？你去問問賬房吧。”

賬房會計說：“櫃上的規矩，年節放假，病假事假欠的工都得補上，干足三十六個月才能出徒。再說，現在還沒到節令。你再干幾個月，到年底才能出徒。”

補就補，我一咬牙又白給他干到了年底。我們一塊兒出徒四個，那三個都走了。那時候，我的手藝在櫃上已是數一數二的了。宋掌柜把我找到後屋，對我說：

“二弟！（三年來他第一次叫我二弟）你別看他們都走了，那種人到哪兒也干不長。……眼下你

有什么困难沒有？”

“有，困难有的是。家里要吃沒吃，要錢沒錢……”

“那好办，兄弟。先从柜上支点工錢吧，給你記下賬，以后从你的工錢里扣。”

宋掌柜和我當場讲好，我的工錢是每月七十吊錢。我心想：反正到哪也是干活，他既留我，就留下吧。先支点工錢解决困难也好。可是，誰料想，这下可是家雀吃了探头食，让人家給抓住了。后来听說外边一般工錢都不止七十吊，那三个师兄弟出去，掙的錢都比我多。这时候，我想走也走不脫了，上哪儿弄錢来还借支的工錢哪？

沒关系，我豁出省吃儉用熬上几年，不信就还不清賬。我这么下了决心，狠干了几年，眼看借支的錢快还清了，偏赶上我爷爷死了。又得去找掌柜的。

一个伙友替我去跟宋掌柜說：“何师傅的爷爷死了，給拉口棺材去吧！”

好說歹說，宋掌柜才答应給拉口薄板棺材，花多少錢，給我記下賬。这种棺材是最薄的了。可是，他却說：“这比慈善会給的强多了。錢还說不上哪百年还得上，这錢要放在柜上，一天就能翻几个个儿。”

接着，娶老婆、生孩子，接二連三，家里出点事就得到柜上借錢，旧賬沒还清，新賬又欠下，年年結賬都有亏欠。

說借支，你以为什么时候都可以借支嗎？不是的。那要看掌柜的需要不需要。比方說，眼看你欠的賬快还清了，看你有走的可能了，这时候，你不張嘴，他也会来献殷勤借給你，好攏住你；若是看你欠的錢一时半晌还不清，你走不了，就是你有天大的困难，他也不管。

有一年，快过年了。我老婆領着孩子，从乡下到城里来，手里拿着一个啤酒瓶子。她跟我說：

“快过年了，家里有老的又有小的，能不能借点錢打一斤豆油家去？”

我說我去跟掌柜的說說，再支点錢。宋掌柜到賬房看看我欠的賬一时还不清，就說：

“你年年总是欠錢，哪百年还清啊？一个油咀，不吃还不行？还錢可得你自个儿想法子啊！”冷嘲热諷，把我气的說：“我們就不該吃油！”說完，我从老婆手里夺过瓶子，順手从窗戶眼儿摔到街上，摔了个粉碎。

就凭我这“拔尖”的手艺，沒年沒节拼命地干，

連个家都养不起。而掌柜的却是越养越肥，在城里，他盖房子开鋪子，一个院套又一个院套，一个分店又一个分店；在乡下，他接二连三地买地，一垧（一垧是十五亩）一垧又一垧……最后，他关掉木匠鋪做别的买卖，用不着我們了，就把我們都解雇了。我正当年輕力壮就失了业。

我总算明白了，掌柜的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正是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手腕！

“和气”的掌柜

孟广运

我十二岁的时候，由我一个本家姑姑介绍，到离我们家二十多里地的一家饭馆里当小伙计。据姑姑说，这家掌柜心眼好，待人也和气，一年到头总是那么笑哈哈地，从来没见过他发过脾气。家里人口也不多，活也不重；逢五排十，五天一集开市跑跑堂，平常日子放放羊，割割牛草，吃的嘛，开饭馆的，那一定错不了。母亲相信了姑姑的话，就让我跟上姑姑离开了家。

我们走到太阳下山才进了店铺，掌柜正和他老婆在院子里喝茶，乘凉。见了我们，果然像姑姑说的那样，马上显出一副和气的笑脸。待姑姑向他说明我的来历之后，他从头把我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嘿嘿地笑了笑，说：“你放心，亏待不了他，亏待不了

他。”姑姑看事已說妥，囑咐了我兩句話也就走了。

掌柜用“亲热”的声調叫着，說：“小孟呀！你剛来，还不明白應該先干什么活。来！我告訴你。每天天黑以前，要先挑滿一缸水，喏，这是水桶，扁担在这里。水桶大了点，你每次挑半桶，多跑几趟也是一样。担完水就趁着天不黑劈劈燒柴，劈完柴就扫扫院子，不过在扫院子前可得洒些水，省得扫的尘土滿天飞。扫完院子就給牛添上夜草，另外，可別忘了堵好鸡窩，天黑以后黄鼠狼就出来咬鸡。好吧，我告訴你这些活，一样一样干着試試看。”

从此以后，我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一直干到大半夜，掌柜家的活真是多得像牛身上的毛，数也数不清，这件沒干完，掌柜就又拉着他那“和气”的声調，說：小孟呀，你干完了这个，就再把“咱們的”那个收拾收拾。等我出去放羊，掌柜又說：小孟呀，“咱們的”牛还餓着哩，你順便給割点儿牛草。他这个“咱們的”說的又亲切、又自然，要是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他在和自己的孩子說話哩。

每逢吃飯的时候，女掌柜就把两个麸皮餡餡，一碗清水菜叶湯送到我手里，这麸皮餡餡是磨白面剩下的皮做的，女掌柜每五天給牛、羊煮一鍋飼料，

上面就用籠屨給我蒸二十五个麸皮饽饽，每天早上一个，中午晚上各两个，湯是他們吃菜摘下的烂菜叶做的。掌柜过这么个三、二天就拉着他那“和气”的声調，說：“小孟呀！現在咱們的生意不好，淨賠錢，真是难維持。先湊合着吃点儿次的，等以后生意好了，咱們再吃好的。”他說这話的时候，还爱摸着大肚子，好像让我相信，那里装的也是麸皮饽饽哩。

我最怕的是逢集的日子。遇到客人上的多，掌柜的高兴，我却实在支持不下了，脑子里好像有一窩蜂子在乱飞。一天，我正端着一大海碗湯，不知为什么，一家伙全倒在了自己的身上，只觉着肚子、大腿一陣凉颼颼地，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經傍晚了，觉着身上火辣辣地痛，看一下肚子、大腿上露着紅絲絲的肉，想动一下，痛的钻心。我口渴的厉害，喊了半天也沒人应声。过了好半天，掌柜才噴着滿嘴的酒气，递給我一瓢凉水，可是他仍然那么慢声細語怪和气的說：“小孟呀！你好啦？可把我急坏啦！不太疼了吧？起来活动活动，吃点儿东西，咱們的羊和牛整整餓了一天啦。”我搖了搖頭，沒言声。

我燙傷的地方，晚上又被蚊子咬了，犯了毒，

腿肿得海碗那么粗，发高烧，昏迷不醒。掌柜的看了，当天就派人给我家送信，叫我家接我回去。

我哥哥推着独轮车来接我，往车上抬我的时候把我疼醒了，听到的还是掌柜的那“和气”的声调：“咳！真是，真是，不知为什么，把自己烫了。其实呢，其实在我这里养着也一样，不过，不过到底不如在家方便。又碰上生意不好，没钱！要是不的话，说什么也得给个拾块八块的。可是，可是，嘿嘿……。”掌柜的说到这里大声的对他老婆说：“去，给他们拿些吃的来，路上饿了好垫补垫补。”

过了不一会，女掌柜拿出三个麸皮饽饽来，放在我的头边。想起我三个月辛辛苦苦的劳动，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一阵气恨，突然噎得我更出不来气了。我伸手狠狠一扫，把三个麸皮饽饽扫落在掌柜的脚边。太阳火一般的灼热，小車吱吱呀呀地在山路上走着。我一会儿昏过去，一会醒来，回头看一眼，大哥满头大汗，艰难地推着我。迷糊中，我耳畔好像又响起了“小孟呀”“小孟呀”的唤声，随着这声音，在我脑子里涌现出掌柜的胖脸，一会儿它却变成了一只笑面虎的大脸……

童工血泪

施灿荣

解放前，在上海西康路上的菜市弄里，有个不大的永福源五金厂。这个厂是怎样起家的呢？那是一九四〇年，民通纱厂有个叫周锡生的“领班”，原先是个地主，他凑了四千块钱，和另外两个人合伙，在菜市弄里租了一间不满三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雇了两个老工人和三四个童工，买了点原料，敲敲打打，弄起了这个专做表带、拉链、铁锁的小作坊。后来，周锡生来了个“大鱼吃小鱼”，把另外两个人的资金并掉，成为他一人独资经营的企业。他把在纱厂做“拿摩温”^①的老婆沈杏娣也叫了回来，做了监工头。到上海解放，这个永福源五金厂

^① 那摩温，即工头。

的财产可真不少啊！光是机器设备，就有电动车床、冲床、刨床、钻床三十多台，扩建的厂房有六百多平方米，雇用了一百五十个工人，至于原料么，周锡生一下子就能买进二十五吨铜皮，折合现在的金额，价值二十多万！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只不过短短十个年头，周锡生怎么会发得这样快呢？这没有什么奇怪，和世界上所有的资本家一样，他是吃了工人的肉，吸了工人的血，才喂肥了他自己。我过去是这个厂里的童工，亲身遭受过周锡生、沈杏娣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自然成了这个如何从一家破破烂烂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五金厂的活的见证人。

靠包身工起家

资本家最残酷的剥削手段，莫过于压榨包身童工的无偿劳动了。周锡生和沈杏娣在这方面是相当突出的。解放前夕，这个厂有一百五十个工人，这里面，包身童工就有一百二十七名。这些童工是怎样来的呢？资本家周锡生、沈杏娣从开厂那天起，为了从童工身上长期掠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乡下的亲戚朋友，专门招收那些父

母不全的孤儿。例如周錫生有个在无錫乡下教书的妹妹，她碰到学生当中有人不幸死了爹娘，就乘机說：“啊呀！小孩子死了爹娘，怪可怜的，我哥哥在上海开工厂，我介紹你們去做外国銅匠，学点手艺，要比乡下好得多了！”一九四三年，这个人用这种欺騙手段，一次就騙了七名童工到厂里来。童工进了工厂以后，老板娘沈杏娣就領他們到楼上佛堂間里，凶神恶煞地說：“你們都是十五岁以下的童工，家中无法生活到了这里，要服从厂里的一切規矩。我是你們的大人，你們要听我的話，不准回家。要是誰走了，我要找介紹人賠償三年半飯錢！”

每个童工进厂，都得在一張卖身文契——关书上按上手印。这張文契上讲明死了与厂无关，一切绝对服从厂主等語。凭了这一張“关书”，童工們就成为資本家殘酷剝削的奴隶了。

延長工时·强化劳动

資本家招罗了大批童工以后，首先是延长工时，殘酷剝削压榨他們。那时厂里規定，凡是童工，一律从早四点钟开工，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歇工，实足足要做十几个小时。老板娘沈杏娣，是厂里的监

工头，她把紗厂里的“拿摩温”对付工人的一套办法，搬到厂里来变本加厉地对付我們这些童工。天还没亮，老板娘就起床了，她一手拿香，走进佛堂，打开收音机喇叭，同时高声地念“阿弥陀佛”，故意吵得童工睡不着觉。之后，她一手拿着念佛珠，一手拿了鸡毛掸帚，走到童工睡的統鋪旁边，掀起被头“啪啪啪”地按着次序打下去，嘴里高声喊道：“小鬼，起来了！太阳爬上屁股了！”“小死人，懶死人，快起来，再睡懶觉我要刮了！”就这样，童工們都被她逼起了床，臉都沒洗，跑到机器旁边，就“蓬蓬蓬”地踏起脚踏冲床来了。吃过中飯，老板娘睡觉了，童工們就在机器旁边吃飯；放下碗，又上工了。到了夜里，童工們已用脚踏了十几小时冲床，早已提不起脚，伸不动手，挺不起腰，精疲力尽了。这时候，老板娘却精神十足地来监工了。要是誰打瞌睡，她就拿了鸡毛掸帚往誰头上抽，碰到誰完不成老板規定的“指标”，就是夜里睡到床上，老板娘也要把他拖起来毒打一頓，还要逼着他去劳动，完成“任务”。这样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一九四六年夏天，厂里有个童工名叫丁林富，他做的是第一道工序——表带扳模，一种坦克式手表带上的

零件。因为鋼皮很薄，生活难做，沒有办法完成。老板眼看完不成指标，第二天其他童工的生产要脱节了，他就把丁林富从床上拉起来，破口大罵：“小赤佬，你倒定心睡觉了，这是你存心捣蛋！”老板一边罵，一面就随手抽过一根皮带，猛力地往他背上抽打。那时丁林富赤着膊，下身穿条破烂的短褲，被这只豺狼打得渾身一条条血痕。这时候，站在旁边的老板娘沈杏娣，变做一只笑面老虎，她見老板打得乏了，就拉住老板手里的皮带，笑嘻嘻地說：“林富，赶快去做吧！識相点，打你也是为你好啊！再不做天要亮了，明早生产接不上，你可要更倒霉了。”老板娘拉着丁林富走到工作台边，又矮又小的丁林富流着泪，縮着身子，在阴暗的灯光下，又“蓬蓬蓬”地干了起来。老板說：“明天下班前，你不做好一万四千节表带零件，我要你的狗命！”夜，很深了，童工們躺在床上，車間里一陣陣沉重的撞击声，像千万个榔头打在我们心上，我們怎么睡得着呢？大家都替丁林富抱不平，心想怎样整治一下老板才好，可又想不出办法来。这次，丁林富沒离开机器，从半夜做起一直做到第二天深夜。

一九四八年夏天，老板周錫生接到一批铁鎖生

意，利潤很高，數目又大。他估計不能按時交貨，就強逼童工拼命勞動。廠裏有個十四歲的童工名叫張淡昌，老板規定他一個人繞鐵鎖彈簧，供應其他十幾個童工。張淡昌拼命地做也來不及。那天，老板娘眼看生產脫節，就拉着他的耳朵把他拖進佛堂間，逼他跪在菩薩面前，她舉起一根雞毛撻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夾頭夾腦地向他打去。一邊打一邊高聲地罵：“小赤佬，你就是偷懶，這批生活做不出來，要你的命，讓菩薩來處罰你，叫你不得好死！”頃刻間，這個赤膊的童工張淡昌，肩上、背上、臉上爆起了無數條血痕，痛得他渾身痙攣，嚎啕大哭。他的手被老板娘打腫了，還被逼到車間里繞彈簧。那時候，正巧張淡昌的娘從鄉下趕來探望他，一進門看他面黃肌瘦，滿身血痕，抱着他就哭，低聲問他：“怎麼啦，你身上弄成這個樣子？”張淡昌看了看瞪着眼站在一邊的老板娘，恨在心裡，却又怕媽媽傷心，只得抽噎地指着身上的血痕說：“媽媽，我發病了，這是刮的痧筋！”

用笨重的機器來吸盡工人的血

資本家的財富一天天增多了，工人中的工傷事

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惨重了！

一九四七年，有个十五岁的童工名叫王才寅，工人都叫他“长脚小江阴”。有一次，他的两只手指被机器轧断了，因为骨头还没断掉，老板娘逼着他用剪刀把手骨剪断，剪断了骨头，又当场逼他把一只手吊在颈里，用一只手在冲床上劳动，痛得他昏倒在车间里。童工们把他扛到搁楼上。睡了三天，不能吃也不能喝，大伙儿要老板送他去医治，老板也不答应。结果就死在搁楼上。他死后，老板还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都把老板恨死了。到一九四八年，永福源五金厂已发展得具有相当规模了，厂房、机器、工人，都大大扩展和增加了。可是由于老板只知发财，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所以在二百五十个工人中，被机器轧断手指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被机器炸瞎眼睛的有一人，有两个童工因工伤而死亡。

老板对待他的亲戚同样不讲什么“人情”，那种残忍的手段，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资本家的冷酷无情的心肠！记得是一九四五年，老板有个外甥，名叫繆福炳，住在江阴乡下。繆福炳五岁时死了爹，七岁时死了娘，兄弟四个，在乡下艰苦度日。到繆福

炳十四岁时，老板觉得机会来了，就到乡下去伪装慈悲地对孩子说：“你们都是我的内侄，既然爹娘死了，还有我这个姨夫在，就跟我到上海去吧，四个人通通到我家吃饭，我供养你们读书！”孩子听了，觉得有这样的姨夫，当然高兴，就跟他来到了上海。可是一到上海，这四个外甥就成了他的童工，同样受尽他的残酷剥削和折磨。有一天，繆福炳的十岁弟弟繆福兴的手指被冲床轧断了，骨头还没轧下来，老板娘就拉着他耳朵，走进佛堂间里，拿了剪刀，对福兴说：“外甥啊！你怎么这样不小心，连手指都轧了？哈哈，轧了也好，到五金厂来当学徒，不轧脱手指是不能满师的，这是做老师傅的记号。来来来，我给你用剪刀修修齐！”话音刚落，老板娘就目光狰狞，一手捏住繆福兴那只鲜血淋淋的手，一手拿了一把又锈又钝的剪刀，“咔嚓”一声，剪起骨头来。可是剪刀钝，剪刀口轧住了繆福兴的手指骨，痛得繆福兴满头大汗，呼喊救命。这时候，老板娘咬着牙齿，猛力剪了三剪刀，骨头还剪不下来，她就灵机一转，对着站在一边的女儿说：“把车间里的大剪刀拿来！”大剪刀拿来了，老板娘脸上露着笑容，在佛坛前对满头大汗、脸无人

色的外甥說：“福興啊！你不要看，熬點痛，剪掉了讓菩薩保佑你！”說着，她一手指指女兒，要女兒捉牢十歲的福興，一手拿着大剪刀，“咔嚓”一聲，把手指骨剪斷了，隨手往香爐里抓了一把香灰，塞在鮮血淋淋的手指上，又敷了點車油，弄了塊破布包上，然後摸出幾個錢幣往地上一擲，皮笑肉不笑地說：“好了！小赤佬，買根油條去補補血吧！”

黃連樹下的童工生活

童工，非但在一天二十小時內被資本家任意剝削和摧殘，就是在二十小時以外，也同樣受盡折磨。解放前，西康路小菜場旁邊有座小小的“七重天”，夜里，他們就在這裡度過每一個夜晚。或許有人要問，什麼叫做“七重天”？這裡的“七重天”，就是永福源廠的三層樓里，再用木板吊起四層小鴿棚，每一層只不過一米高，有十五平方米，要睡十五個人，寒來暑往，童工夜夜睡在這裡。而這種“七重天”的地鋪，還是年紀較大的童工才能“享受”的。那時全廠一百五十五名工人，睡進“七重天”的只有六十名，有九十名小童工，夜里沒處安身。冬天，小童工縮着身子，蓋着麻袋、廢回絲，擠在水泥地上

的冲床底下。夏天，“七重天”上热的像蒸籠一样，爬到里面，像进了火海，根本没法睡觉。那时候，童工們只有成群結队到小菜場去过夜。可是，从厂里十一二点钟下工，睡到夜里三四点钟，菜場要上市了，童工們只得躺在馬路上。这真是人間地獄，我們永世难忘！老板为什么要搭这“七重天”呢？道理很简单，他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在工人身上多花一分錢，他是不干的。举个例來說吧，那时候“七重天”里装的电綫都是廢旧电綫，要是稍不小心，随时都有触电危險。有一天，有两个童工黑夜爬进去睡觉，忽然間，肩背被天花板上的电綫吸住了，全身麻木，幸亏断了保險絲，这两个童工生命才未断送。

晚上沒处睡觉，对童工來說，还算不上是最大的苦难。老板的更加毒辣的手段，就是为了賺更多的錢，长期不給吃飽肚子。那时候，每天为老板做近二十个小时的牛馬活，可是童工們每天吃得是什么东西呢？燒早粥的时候，老板娘站在旁边看着，燒得干了，老板娘不但要打罵，而且要放进冷水，使粥由厚变稀。那时八个童工只吃一小桶薄粥，吃完了就不能再添，誰吃得慢，誰就餓半天肚子。即使吃得很快的人，肚子也是同样挨餓。因为那种稀飯，

稀得可以照見人的面孔，如果把飯勺用力放进粥桶，粥濺起来可以濺到樓板頂上。我們每天送稀飯的“小菜”，常常是八个人一撮盐，用筷子沾沾，有点盐味，就下肚子。到了夏天，老板娘就叫我們到垃圾箱里去拾西瓜皮，切成小块，放上盐給我們当菜吃，按照老板和老板娘的說法，这是他們乡下的“名菜”，“吃了不会生病”！这样还不算，更加毒辣的是，夏天早晨，老板娘故意多燒稀飯，每一頓，总要多燒七八小木桶，放在老板娘房里，放到中午，稀飯发酸了，她才拿出来給我們吃，这样，可以使童工們少吃。这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資本家的毒蛇心腸！有时，童工們拿了发餓的稀飯吃不下去，老板娘站在旁边看着，就强迫童工往下吃。說不吃是装病，想躲懶少干活。有一次，有一个童工实在吃不下去，她就說：“为什么不吃？”伸出手掌，“啪、啪”打了童工两下耳光，并且像个女流氓似地罵开了。

不吃不行，吃多了也不行。有一次，剛吃过早飯，有个十六岁的童工陈兆祥，因为肚子沒有吃飽，拿了飯碗走进老板娘房間里去盛粥，說：“我还没吃飽！”老板娘見了他笑笑，随手捧着一鋼精鍋叉

干又白的稀飯，对兆祥說：“来，小赤佬，沒有吃飽我端給你吃！”她說着就跑下樓来，在車間里当着許多童工，盛了滿滿的一碗，放在陈兆祥面前，叫陈兆祥吃。她一面看陈兆祥吃，一面一手捧着鍋，一手高举着飯勺，看陈兆祥吃完，就用手里的飯勺又給他盛滿了，二碗、三碗、四碗、五碗……一直吃到十多碗，陈兆祥知道不对头了，实在吃不下了，老板娘却硬是逼着他把滿滿的一鋼精鍋子粥吃下去。粥是吃完了，可是陈兆祥脹着肚子怎么也爬不起身，这时候，老板娘就逼他劳动，还狠狠地罵：“你吃倒会吃，做倒做不动！”举起手来，拼命地打了起来。童工們从早上四点钟起，要劳动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又沒有吃飽，怎么行呢？由于饥饿，童工們不得不在夜里下工后，到菜場里去拾菜皮，放在一只小罐头里，到隔壁翻砂厂的火炉上燒熟了吃，作为一顿夜点。

黃連樹下的童工生活，比黃連还苦。长年累月，沒有廁所，沒有工資，沒有开水喝，沒有毛巾洗臉，沒有衣服穿，凡是一个人的最起碼的生活权利，全都被老板剝夺了！那时候，我們許多人用麻袋遮身，夏天睡馬路，冬天就睡在旧回絲堆里。我

們几个月不洗一次臉，身上老白虱多得可以随手抓。那个时候，老板規定半个月有一个“休息夜”，什么叫“休息夜”呢？所謂休息夜，就是到了該休息的这一天，从早上四点钟开工到夜里七点钟歇工，歇工后，老板娘監視着我們大扫除，把車間里所有的垃圾扫干淨，然后逼着童工們从垃圾堆里拣銅屑，拣完了，已經九点钟敲过，要是想去洗个浴，浴室已快放水关門了。第二天早上又是四点钟开工！这就是“休息日”。那时候不管天冷天热，厂里不供应开水，童工劳动得气喘嘴干了，只好偷偷地到小菜場井边去喝冷水。早晨，大伙都不洗臉，每个人的臉孔，黑得像鍋底一样。有一次，有个童工弄了只小铁罐，晚上下工时，弄了点冷水放在火炉上燒，准备洗洗身。誰知道开水炸掉了盖子，把臉上燙得全是水泡。至于工資，那就更不用說了，老板每月只发給我們剛够剃一次头的月規錢。

我們童工，就是这样蓬头垢面，身上无衣，挨餓受冻地度过漫长的学徒生活的。

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給了我們新生

上海解放了，我們得到了新生。一九五一年，市

总工会特别关心这个童工厂，专门派了工作组下厂来整理工会。这个工厂，是全上海第一批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工厂中的一个。解放前在这里得了肺病的三十多个工人，得到了医疗，有的还进了工人疗养院。全厂工人的工资进行了合理调整，平均工资达到七十元。领导上还拆除了“七重天”，新建了工人宿舍，原来睡地铺的，都睡上了木床，不少工人还搬进了新村。一九五三年开始，全厂机器设备全面进行了改革，逐步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每台机器都装上了安全防护设备。工人只要站在机器旁边，注意它运转就行了。我们这批解放前的童工，绝大多数都支援到外地参加建设，留在厂里的，有的人当上了技术员，当上了干部。有些同志参加了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要是没有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这批奴隶不知要被旧社会吃人的资本家摧残到何等地步啊！

（沈霞整理）

徒 工 坟

王信敏 整理

一进入青島华新紡織染厂的大門口，便能看到一处极为美丽的花园。誰能想到，就是这座花园，在四十多年以前，却是一处阴森森的“艺徒”坟地啊！几位曾当过徒工的老工人，对当年“华新”的一千二百多名徒工的悲惨遭遇，仍然记忆犹新。

謊 騙 招 工

四十多年前，在黄河岸边利津一带，正当大批灾民走投无路的时候，“华新”的老板們派出大批爪牙，勾結当地官府，来到灾区，大量招收徒工，美其名曰“艺徒”。資本家在招工布告上写着：艺徒进厂以后，半天做工半天上学，吃大米洋面，穿洋布新衣，住瓦房洋房。每七天一休假，每月工資五

块“大头”，一年出徒，出徒后工资最少三十块“大头”……他们把徒工的待遇说得天花乱坠。

陷于绝境的灾民们，虽然半信半疑，但是，眼前走投无路，为了找条生路，做父母的含着眼泪，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招工贼。

华新纺织染厂的资本家就这样趁火打劫，用欺骗的手段在广大的灾区招收了一千二百名廉价劳动力。这些可怜的小徒工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他们跳出了苦海，又陷进了火坑。

囚徒生活

这一千二百多名小徒工被老板用马笼车一批批地运来了青岛。进厂以后，他们身上换上了厂里专门用花包布做成的黑衣服，衣服的袖口上镶着一道蓝杠。徒工们穿上这种衣服，就像犯人一样被拴上了一条锁链。

徒工们住的不是什么瓦房洋房，而是一些又窄又矮的黑屋子。屋内有两条用土堆起来的大土炕，每间屋睡六十多个人，屋顶上仅一层薄瓦，遇到下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每间屋子仅一个小门，两个小窗，窗上还钉着几根粗铁棍，屋子四周

筑有高大的圍牆。牆門口，日夜都有廠警站崗。這哪里是宿舍，簡直是座牢房。

一到數九寒天，每個徒工只能從資本家那兒領一床用花包布和落腳棉做的小薄被子，有蓋的沒鋪的，到了夜里孩子們都凍得睡不着覺。有一次一個叫劉守的徒工，夜里凍得起來坐着，嗚嗚咽咽地哭爹喚娘，被查夜的“看號司”聽見了，進去抓住小劉的頭就往牆上撞，一連撞了五、六下，連吵帶罵的將劉守的被子甩到院子里。劉守被撞得頭破血流，渾身凍得直打哆嗦。

到了夏天，屋子里人多，加上又矮又潮濕，一進去就像進了蒸籠一樣。屋內的蚊子、虱子多如牛毛，徒工們無法睡覺，個個都長了滿身的膿泡、疥瘡。老板怕夜里有人乘上廁所的時候跑掉，便索性將便桶都放到屋里，門上加上大鎖。弄得滿屋又臊又臭，沒法喘氣。一個叫呂正田的氣極了，便罵道：“他媽的，把我們都當成了牲口啦，拉屎尿尿都管起來了。”罵聲沒完，門上的鎖嘩啦一聲開了，突然闖進了一群“看號司”，一頓鞭子當場把呂正田打得昏了過去。呂正田被打以後，一直躺了二十幾天才慢慢能動彈了，腿上卻留下了一片片傷疤。

徒工們每月的工資不是五塊“大頭”，而是三角錢。就是這微不足道的三角錢，也不頂三角錢用。資本家真是雞腕眼里算出米粒來，他在廠里開設了一處所謂“福利”商店，賣的日用百貨都比外面貴幾成。工人的工資每月不是發現洋，而是發給只能在他們開的商店里才好用的“華新票”。這樣一來，每個徒工只好眼睜睜地叫資本家再剝去一層皮。

徒工們吃的不是大米、洋面，而是些發了霉的雜糧面餅子。餅子里有草、有麻袋毛，還有砂子、蟲子，吃到口里又苦又澀，真難下咽。就是這樣的餅子，也不讓吃飽。吃飯時，也不停車，一邊干活一邊吃。那時車間里花毛飛滿天。有的小徒工把餅子放在車頭上，巡迴一趟咬一口，不等一個餅子吃完，餅子都成了棉花團團了。不少人因此得了病。小徒工們過着這樣的非人生活，進廠不到三個月，就被折磨得面黃肌瘦、骨瘦如柴。

不但飯吃不飽，干了一天活，連口水也撈不着喝。徒工們渴極了，只好偷偷爬到一個為生產用的兩人多高的開水鍋里去舀點水喝。不知有多少人，因喝水挨過打；有的甚至送了命。有個叫尹之清的小徒工，因為頭天晚上瀉肚子，第二天勉強支持着

上了班。干了一会活，便觉得口渴、嗓子眼里直冒烟。趁把头不在，他拿着碗去舀水喝。他拖着病身子，费了好大劲才爬到水锅旁边。这时，锅里的水已经被蒸气烧的滚开了，正冒着热气，小尹刚想探下身子去舀水，只觉得眼前发黑，一头就栽进了锅里。他狂叫一声，别人发现了，连忙把他拉了出来。可怜的孩子离开水锅还没走上几步，便一头栽到地上咽了气！

狠心的老板，不仅夺去了徒工在厂内的自由，就连千里以外的亲人也被隔绝了。他们勾结地方官府，按照“合同”上规定的条款，在徒工学徒期间，一律禁止徒工家属的探访。不知有多少父母为儿子哭断了肝肠，气瞎了眼睛。有一个叫王金堂的徒工，从他离乡后，父亲就染病不起，因无钱医治而去世了。他母亲埋葬了老伴，带着小女儿，沿路讨饭，餐风宿露，走了一百多天，在半路上小女儿又饿死了。这位母亲忍着悲痛，拖着沉重的双腿，好歹到了华新纺织染厂。老人含着眼泪向厂警打听儿子的情况，希望马上能看见自己想念已久的儿子。可是，这狼心狗肺的厂警不理睬她，不让她进去，老人苦苦哀求，厂警反而大怒，道：“你的儿子早已死

了！”老人一听，信以为真，她一下子昏倒在地，苏醒过来后，絕望的双眼，滿含着泪水，两眼直瞪着大铁門，口里不住的叫着儿子的名字，一头撞死在华新紡織染厂的大铁門上。这位饱受旧社会苦难的母亲，用自己的死，向那吃人的資本家作了最后的控訴。

殘酷迫害

徒工們在衣、食、住、行上所受的虐待和剝削，已經够凄慘的了。但这还不是最凄慘的，最凄慘的是，資本家还私設刑堂，制訂了一大套所謂“厂規”，他們可以任意打、杀甚至活埋那些他們认为違犯厂規的徒工。皮鞭、大板、“板房”，天天陪伴着他們。这些无辜的孩子，有的被折磨成殘廢，有的被害身死。細紗車間有个叫曲有的小徒工，扫地时不小心，碰了一下陈領班的褲角，當場被这个姓陈的狠狠踢了一脚，瘦小的曲有被踢倒在車底下，碰得头破血流，半天沒喘上气来。从那以后，曲有成了殘廢，沒活几年就死了。徒工戴安乐，有一次不小心搖坏了一点点紗，就被罰在車間的洋灰地上，跪了四个多钟头，两个膝盖都跪肿了。

徒工們在如狼似虎的領班們跟前，不准說個“不”字。有一天，一个叫呂嘉林的徒工，干活時和一個領班頂了一句嘴，除了當場被領班抽了一頓鞭子外，還被罰干連班（一連干二十四小時）。呂嘉林湯水沒進，疲勞不堪，干到二十多個小時的時候，實在支撐不住了，身子一歪，正碰到皮帶上，霎時被皮帶卷上了天軸，甩上了半空，被甩得粉身碎骨。領班發現停了車，過去一看，一聲冷笑，捂着鼻子就走了。

徒工們受不了這般非人的虐待，便千方百計的想法逃出虎口。有一天下大雨，被押解去上工的徒工趁機逃走了七十多個。可是王德成和張龍兩個小徒工，沒跑得掉，被抓了回來。資本家為了殺一儆百，把全體徒工都召集在一起，當場把他倆人倒剪雙手吊了起來，用皮鞭、軍棍打的死去活來。打完后，資本家惡狠狠地對全體徒工說：“今后誰再逃跑，抓回來格殺勿論！”徒工們把奄奄一息的王德成和張龍抬回了宿舍，不到一天，他倆都死去了。

慘遭橫死

飢餓、勞累、皮鞭，奪去了徒工的健康，生病

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资本家哪管徒工的死活。他们玩弄假慈悲，从外边弄来一个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潘月锄，给徒工们当大夫。这家伙仗着和资本家有私人关系，根本不懂医术，给徒工们看病，轻病治重，重病治死。他拿着比徒工高五十倍的工资，握着脚趾丫，一见有看病的，就皱起眉头骂道：“又长猪瘟啦！给我滚过来。”说着胡乱一摸，顺手甩给一包早已准备好的药，不少有病的孩子，吃了他的药，病越发重了；有的甚至被毒死。大伙气的都叫他“潘蝎子”。有个徒工叫黄延福，第一天发烧，找“潘蝎子”看了看，弄了付药吃，结果第二天病的不能动弹，第三天便死了。死的时候两眼大睁，遍身发青，鼻子、口里淌血，很明显是吃药中毒而死。从此，徒工们有了病，宁肯死挨死等，也不找“潘蝎子”看。这样一来，正合了资本家的心意，不求医生就不是真病，得给我干活。因此，很多得了重病的徒工，被监工的鞭子逼着走进车间，拼死咬着牙强干，勉强支持，有的支持不住了，一头倒在车间里便人事不省了。

一到夏天，由于生活条件低劣，徒工们很容易染上传染病。有时一场流行病，便要夺去不少人的

生命。資本家既不肯改善徒工們的生活和衛生條件來減少疾病，又生怕徒工都死淨了，沒有給他們干活賣命的，便設了一個“休養間”。徒工一有了病就被抬進“休養間”隔離起來。那種休養間，實際上是一個“停屍房”、“活殺場”，只要進了休養間的門，就別想活着出去。每隔兩天開一次門，往外抬死屍。每次總要抬出去幾具死屍。更殘忍的是：有的徒工還沒有死，就被放進薄皮棺材，活活埋掉。現在的李宗仁老師傅還清楚地記得：和他同鄉的一個叫劉上和的生了一種傳染病，還沒有死，就被硬裝進了棺材。往里裝的時候，他還搖擺着手，喉嚨里還有微弱的“哼哼”聲，鼻孔里還有熱氣。可是殘忍成性的資本家，還管你這徒工的生命呢！

在毫無人性的資本家的剝削、壓榨、折磨下，一千二百多名徒工，一天天減少了。不到三年時間，就被折磨死了三百九十多人。在埋葬徒工的墳地上，小土堆一天天多了起來。到解放時，一千二百名徒工只剩下九人。

在徒工的墳墓上，資本家卻大發橫財，又建立了一座座新廠房。

昔日“华贞”

顾方

华贞女子实习所

一九一九年的秋季，天津北門臉兩間座北朝南的樓房門口，挂出了“华贞女子实习所”的大字招牌。

跑合棉紗的王兴周用靠投机倒把剝削来的錢，在北馬路开起綫店来了。

在当时，这是一个別开生面的百貨綫店——十一个店員都是女子。王兴周想用这个办法招攬顧客，大发其財。

“华贞里全是女人卖貨！”这消息被当做新聞在外面一傳十、十傳百，于是“华贞”的生意真“兴隆”起来了。想买东西的人到这里来，不想买东西的人也要特意来看看。这些女店員，就成了一些人“参

观”和“評头品足”的对象。紧接着，一些流氓地痞不时地来歪纏搗乱了，他們嘻皮笑臉，尽說些下流話調戏女店員。女店員只有忍气吞声，不敢得罪一个人，因为王兴周說过：来买东西的都是“財神爷”，誰得罪了“財神爷”就得砸飯碗。

一天对付过去，好容易关上門板能松一口气儿了，但她們还得提防王兴周。这些女店員每天都得住在店里，不准回家。这样“内外夹攻”，女店員实在呆不下去，一个接一个辞职不干了。不到两年，都走光了。王兴周这才又招收一批男店員，改名为“华貞百貨綫店”。王兴周像个吸血虫，吸尽了职工身上的血，使自己的买卖一天天扩大起来。到一九四二年，又在估衣街西口增設了“华貞新号”。

进店如卖身

要想进华貞做事，首先要“闖五关”——資本家規定的“五不要”：

- 一、本市人不要；
- 二、沒有三年文化程度的不要；
- 三、外貌长的不美观的不要；
- 四、結过婚的不要；

五、沒有鋪保的不要。

闖過這五關進到店裏，還要在所謂保證書上簽字畫押。畫押以後，等於寫了賣身契，再也沒有一點人身自由了。請看這十項“鋪規”：

一、不准留頭；

二、學徒三年期間，一律不准回家；

三、不准隨便外出，如經批准有事外出，必須經人搜身；

四、不准看書看報，但必須參加念經活動；

五、不准吸煙飲酒吃蔥吃蒜；

六、不准交頭接耳，成群結伙；

七、不准隨身帶錢；

八、店內不管治病，也不准在店內養病；

九、不准隨便使用店內物品；

十、只許東辭伙，不許伙辭東。

只要看一下這張“鋪規”，就可以知道，年輕的店員在這裡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除了不准這個不准那個的限制外，王興周還想方設法來腐蝕店員。在店裏，每天早晨天剛亮，他就要叫醒店員們，領着店員做“早課”——念佛經。念經前還要“訓話”，經常說的一套是：

“人生在世，要修好积德，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这辈子做了坏事，下辈子就有报应；这辈子偷了人家，下辈子托生得还人家。你们看见小鸡吗？那就是上辈子偷了人家，这辈子下鸡蛋来还。”训完后，他就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接着向身旁的两个大同事（他的亲信）问：“昨天谁卖的錢多？”

“老徐。”

“谁卖的錢少？”

“老楊。”

他听了，眨眨眼，放高了調門說：“昨天老徐卖的錢最多，他是好样的；老楊……哼，是孙子孙子重孙子！我告诉你们，谁要是总不卖錢，我这里可不养廢物！”

王兴周就是这样对店員又吓又騙，又哄又罵，使尽了一切坏水！

“十三太保餃”和“香骨菜”

店員們一天天地給資本家卖命，每天吃的是什么呢？

商店的后楼，經常有一两个学徒在那里篩面，这是王兴周想办法用低价买来的发潮、有苦味的棒

子面。店員每頓飯就吃這種窩頭，還有粗糙的“文化米”。

吃飯時，大家圍坐在一條長桌上，桌上擺着兩盤菜，每個人手拿黃而發黑的窩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吃不下去。這時候，王興周蹣跚蹣跚地來了，見大家對着飯愁眉苦臉的樣子，故意問：“今天吃什麼菜啊？”（其實，是他早已經吩咐好了的。）

“……”無人回答。

“噢，炒芹菜！”王興周指着菜盤子說：“芹菜是好東西啊！你們知道嗎？芹菜是‘香骨菜’，吃了不僅可以長壽，就是死了以後，骨頭都是香的，蒼蠅也不往上落。好，大家吃吧，吃吧！”說着，訕訕地出去了。

“呸！芹菜這麼好，你怎麼不吃！”

“這叫什麼芹菜？老得繩子似的！你試試，嚼得動嗎！”

“這還是‘關心’咱們呢！”

“去他的吧！老虎戴素珠——假充善人！”人們紛紛議論着。

請聽在同事里流傳的這幾句話：“黃瓜總（種）吃，韭菜老吃，豆角長吃，餃子一年到頭吃。”

說起来很好吧！其实，真正的内容是：黄瓜老了，籽多了才吃，韭菜老了才吃，豆角长长了，也是老了才吃，饺子是腊月三十晚上吃一顿，正月初一吃一顿。

这样的饭菜，大家哪里吃得下？咽不下去，吃得很少，这正达到王兴周的目的地：给他省东西。

就当店员们对着饭菜发愁的时候，王兴周却在厨房里看着厨师给他做“素炸四扒”呢！他“念佛”不吃荤，专门吃素，由那个专门请来的厨师傅用素材料做成鸡鸭鱼肉，做的完全像真的，价钱也分外贵。他还经常吃用鸡子和面做的面条、喝银耳汤。他吃的饺子经常是由十三种过油炸的材料作馅，名唤“十三太保”的饺子。经理室的里面，有一个小套间，是他的“秘密室”，里面存着整桶的小磨香油、美国方袋面，供他自己享用。

毒疮折磨一年半

张学贵来学徒的第一天，就被打发到厕所里的暗楼上去睡觉，那狭窄的床板上已经挤了好几个人。夏天，厕所里臭气熏天，蚊子臭虫咬得人身上的疙瘩连成片。王兴周在这里也有一条规定：不准夜里

开灯拿臭虫，怕费电。

張学貴在这里睡了不多日子，右腿的“迎面骨”处被毒蚊子叮了一口。他起初沒在意，痒了就抓，不想潰烂成疮了。慢慢的，膝盖以下的整条腿都肿了，脚也肿得穿不上鞋，只好找伙伴借双大鞋穿。他不敢声張，因为資本家經常說：店里不給同人治病，也不許在店里养病。每天还得十几个小时不停地扫地、擦玻璃、团煤球、出去送貨等等，拖着那条疼痛难忍的腿，不敢吭声，怕資本家知道了开除他。这小伙子每天咬着牙干活，直到深夜別人都睡了，他才打一盆热水，洗洗伤口。但是光洗洗有什么用？疮还是流膿流水，越来越严重。一次，他硬着头皮向管事的大同事請半天假，說是有点事要出去办一办。他慢慢挨到一家医院，医生說他治晚了，已經变成毒疮了，給他洗了洗、上点药，叫他每隔一天到医院去一次。張学貴一听就膩了，自己哪有这样的自由？他只得在外面买了点药，自己上一上，再也不能去医院了。过了整整一年半，張学貴的腿才逐漸好轉。

“妙” 算

忙时添人，不忙时辞退人，这种手段对王兴周最合算，而对每个店員的精神有多么严重的威胁啊！王兴周計算得很清楚，每年六月七月是綫店的小旺季，九月十月一直到春节为大旺季。这样，每年夏初时上一部分人，在被称为“金九銀十”之前再上一部分人。可是春节一过，淡季来临，王兴周就要解雇人了。仅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初五这一天，就解雇了十八个人。所以每到初五这一天，大家都是坐立不安，只要看見学徒来找誰上楼去，准知沒好事。

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华貞新号”后院盖三楼照棚，屋里修建洋灰地基。王兴周突然召进二十多名学徒。这些学徒破例准許回家，早来晚走。干完一天活，渾身像个土猴似的，到綫店干活怎么像从土里爬出来的呢？原来他們干的是搬磚运瓦的活，每天从北門臉的門市部往估衣街“新号”搬磚，还給瓦工搭下手，两个月以后，三楼盖成了，除了留下三个人以外，其余全都辞退掉。原来，这又是王兴周的“神机妙算”：名义上招雇徒工，只管飯不出錢，这样可以比雇来的小工还听使喚。

王兴周对店員說：“我这里上不养老，下不养小，业务不忙，闲人一律不要！”

特殊任务

白天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晚上还要轮流“坐夜”，坐夜的两三个人，除了要到各处轉悠以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得給王兴周捶腿、捶腰。

吃得脑滿腸肥的王兴周躺在經理室的床上，把左手伸出来了，坐在床前凳子上的学徒王順林。王順林一手托着王兴周的胳膊，一手給他捏，先是大拇指，然后食指、中指……每个手指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用不大不小的匀称劲儿捏到，捏完手，接着捏胳膊，左胳膊捏完了，換右手，王兴周扭身朝里了，接着是捶背、捶腰、捶腿……等把这个老家伙侍候舒服了，王順林已經精疲力尽了，他头昏脑脹、两眼发澀、两手沒勁、腰酸背疼，多么需要躺下来甜甜地睡上一觉啊！不行，甜蜜的梦乡岂是小学徒能輕易进去的！王兴周揮揮手，王順林就得按照“規定”，捧起一本《妙法蓮华經》念着。当听到王兴周响起了蠢猪一样的鼾声时，王順林的脑子也麻木了，他念着念着，脑袋耷拉到胸前，睡着了。

忽然，耳旁一声大吼：“小王八旦，誰叫你睡觉的！”
王兴周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抬起脚来就踢。

“誰让你睡觉？”

“我……太困了。”

“困？我叫你醒醒！”王兴周唤来另外一个学徒，
“他困了，拿水噴他！”

一脚踢开病倒人

平常辛勤工作，为王兴周卖命干事的人，只要病倒了，馬上被一脚踢开。那个曾被王兴周称为“好样的”老徐，卖貨时总是精神百倍，对待顾客又和气又周到。他拿出全副精神尽量多卖貨，該吃飯了，他也不願离开柜台，实在餓极了，跑到后面去好歹吃两口，又匆匆忙忙地跑到前面来。

“你吃飽了嗎？”同事見他吃得这么快，都有些奇怪。

“吃飽了，卖貨要紧！”

白天累，吃不好，晚上睡觉少，不久，这个小伙子就有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王兴周一見，臉一沉：“身体不大好啊？出去养去吧！”

“六爷，叫他在这养吧，他家离天津很远，叫他

怎么走啊！”人們替老徐求情。

“我管他怎么走！”王兴周拿出“鋪規”指着說，“这里不是明明白白写着了嗎！”

同人无奈，把老徐的亲戚找来，大家湊錢給买了車票，送他們上火車走了。

老徐为什么那么卖力干呢？他是想多卖貨多賺点工錢。

原来王兴周对职工不是实行月薪制，而是用了一个叫“牵牛”的坏招分帳。所謂“牵牛”的办法，就是誰卖一百块錢，就分两块錢，卖的多就分得多。店員拼命干，自己得到的只有一点点，大批鈔票却进了資本家的腰包。辛桂林的下場比老徐还要悲惨。辛桂林，累得大口吐血后，他不敢声張，白天还照样站柜台，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躺下再也起不来了。王兴周知道了連面也沒見，告訴辛桂林的荐举人，把他接走。轉年初冬，华貞門口来了一老一小，眼泪汪汪地来取辛桂林的行李，人們知道，辛桂林已經死了。

王兴周榨取尽店員工人的血汗，就把他們一脚踢开了。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九年十年之中，就有五十七个店員得了肺病、心脏病，其中十八个

人被王兴周赶出以后，不幸惨死。

店員憤怒了

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农历腊月十五日。往年到了这个日子，照例應該改善伙食了。可是王兴周和他小老婆林耀华商量之后，这天晚上突然向大家宣布：今年买卖不賺錢，不換飯了，年終“饋送”也免了，等明年买卖好了再补。这消息引起了极大憤怒，大家盼了三百多天的“饋送”取消了，家中的老小怎么过年！說买卖不賺錢，这是弥天大謊。买卖明明很兴隆嘛，这騙得了誰！知道內部底細的老店員老崔向大家揭露了王兴周欺騙店員的丑恶面目，原来王兴周在盘貨“拉紅单”时，將許多商品按低于市价的价格盘存收帳，从帳面金額上看，自然是賠錢了。实际，倉庫里的貨物堆积得滿滿的。这套戏法被揭穿后，多年来压在店員心底的憤怒不可抑止了，由一部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店員，开始在华貞新号酝酿罢工，接着消息傳到老号，两个門市部的一百多个人紛紛签名，提出“不发年終饋送、不改飯食，坚决不开門”的口号，全店开始了总罢工。

店員提出四点要求：

- 一、改善伙食，
- 二、发放年終双薪，
- 三、不能任意开除店員，
- 四、改变“牵牛”工資制，实行月薪制。

店員自己也訂出必須严格遵守的条例：

一、資本家如因罢工，借故解雇一个人，大家一律全体罢职；

二、罢工期間，凡有关集体事項，事无巨細均應經全体研究决定办事；

三、任何人不准走漏內部消息；

四、不許个人随便走出店門；

五、每个人的“保证人”来店領人，一律不見。

大家把商店的后門鎖上，钥匙掌握在同人手里。由三个人在門口坐着看門，有顾客来买东西，就告訴說：“我們这里修理內部，您到別处去买吧！”

另外，通过會計把資本家偷稅的后賬搬了出来，作为斗争的一个方面，准备必要时向資本家摊牌。

当被选出的代表去見資本家之前，全体店員一致表示：你們放心好了，誰要是敢开除你們，我們大伙全都不干了。

團結就是力量。有了全体店員的支持，更增強了代表們的斗爭信心。

斗爭就是勝利

王兴周开始狂妄揚言：“你們这群穷小子能鬧得出王六爷的手心去嗎？”“甭鬧，一个也跑不了！”店員們的回答是：“打算跑就不鬧罢工！”

資本家想用不买粮的手段，把职工餓跑。当店內仅存的粮食就要吃光的时候，店員代表去見王兴周，要他买粮食，并告訴他：“店里沒有粮食了，你家里再来領也沒有了，要挨餓咱們一块挨。”他这才拿錢买了一包米。

接着，王兴周打算打开保險柜，取出全体职工的鋪保，店員对这一手也早有防备；事先派三个人坐在保險柜上，告訴王兴周說，沒有全体店員的話，任何人不能开柜！

这几招失敗之后，王兴周又要出了一招，花錢請来个律师进行“調停”。結果也被店員們頂回去了。于是王兴周抬出了最后一張王牌。他請来估衣街派出所伪警长和警察局的一个什么員来和店員进行談判。王兴周仗着有台柱在場撐腰，气势汹汹。

那个伪警长威胁代表說：“你們如果繼續鬧下去，就是破坏社会秩序，我要逮捕你們。”店員代表毫不畏惧，据理力爭，也沒有被吓倒。王兴周見职工們團結得这样坚强，又看到正是年关进錢的季节，終于不得不接受了店員提出的四項条件。

連續了十三天的罢工斗争終于获得胜利了。

永远不忘过去

在华貞第一門市部的办公室里，昔日的学徒，今日的党支部书记沉重地向我讲述着过去。他的面前放着一張鋪規、一張进店保证书、一本《妙法蓮华經》、一小筒药膏，还有一本一九四二年的流水賬。这些一頁頁的紙張，已經旧得发黃了，張学貴治毒疮用剩的那一小筒药膏，也早已变干了，說明它們存在的那个时代已經被深深地葬埋很久了。但是，它們仍然值得保存，因为这是历史的見证！

望望面前这些东西，然后再抬起头环顾一下这间屋子，心情立刻轻松活跃起来，瞧！这四面墙上挂了多少奖旗和奖状！这个商店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年年季季被評为市公司級的先进单位，从一九五九年以来，連續三年被評为市級模范单位，一九

六二年更光荣地被評为市級特等模范单位。

一張奖状和一本《妙法蓮华經》，雄辯地說明了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鮮明对比，說明了人們在新旧社会中生活的不同面貌。

柜台生活四十一年

曹杏声

我今年已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从到上海小东門大昌協記綢布商店学生意开始，一九三九年大昌協記綢布商店盘給南京路上的大昌祥，我也跟了过来，一直到現在。屈指算来，不觉已度过了四十年的柜台生活。可是，在那旧社会的二十六年柜台生活中，它包含着多少愤怒的往事！多少痛苦的回忆！

学徒学的哄骗

十六岁那年，有个远亲跑到我家里来，說給我找到工作了。临行时，他以长辈的口吻对我說：

“杏声啊！学生意可不比在家里，万事要忍气吞声，至少得做三年的奴僕呀！”我当时不懂什么奴僕不奴僕，只知道有了工作，可以挑起一些家庭生活的

担子，于是就高高兴兴的到了上海。一进大昌协記綢布商店，老板側着肥脑袋，凶利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大概看到我身体还結实，就把手一挥，算是录用了。从此，我就开始过那奴僕的生活。每天天沒亮就要起床，倒痰盂，泡水，扫地，揩桌椅，揩櫥窗，脫排門……；晚上打烊后，我們当学徒的更忙了，要理紙头，扎帶紙，做票签，倒水烟筒，忙得热天手指經常磨起泡，冬天十个指头冻得皮开肉綻，鮮血淋漓，但是你还得不停地做。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等休息下来，已是深夜十一、二点了。那时，学徒是不能住宿舍的，只好睡在店堂里。晚上搬出鋪盖，往地上一摊，一夜就算过了。冷天，西北風从排門縫里呼呼地钻进来，直往被窝里吹，冷得你嗦嗦发抖；大热天，地上的热气向上蒸，热得你汗流如注人发昏。加之門外車馬声响个不絕，門里麻将声噼噼啪啪，被窝里臭虫很多，困觉真好比活受罪。等你剛剛合上眼睛，門外一声高喊，倒馬桶的来了。我們把它当作起床的号声。这时如果不起来，被老板看見，会把你踢出店堂，叫你滾蛋。就这样，我苦苦地熬过了三年的奴僕生活，滿以为这下子可以为家庭挑些担子了，

不料老板找我去談話，賊頭狗腦地說：“小家伙，這三年表現還不錯呀，現在給你拜先生了。”

“呀！”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老板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要我拜協理殷某為師。於是我就重新再學生意，又開始了新的奴僕生活。那天，“先生”對我第一次談話：他手里捧着一只水煙筒，陰陽怪氣地說：“杏聲，你要學會做生意的‘門檻’嗎？”我說：“要！”他又說：“你要學會做生意的‘門檻’，必須牢記三個字——哄、噱、騙。”我想：我出門來學生意，難道就是來學這一些“門檻”嗎？但是我在店堂里看到的，確是事實，每一筆生意，都必須以這三個字為準則，如果誰違反了這三個字，就有被解雇的危險。那時虛偽的號召可多哩，什麼足尺加一，其實這好比變戲法，手里抖一抖，顧客買到的比不加還要吃虧；什麼買一送一，其實“送一”的鈔票早已加在“買一”的料子上了；什麼曬賣，賤賣，大拍賣，吹吹打打大喇叭，其實顧客買到的真是貴上加貴。我是個老實人，有時我做一些老實事，竟然會闖禍。有一次，一位顧客在我手里買一件毛葛馬褂的料子，我替顧客精打細算節省了一寸料子，被老板看見了，在一次經理訓話會上，点到

了我的名字，說我不会做生意。他說：“做一个伙計，應該是拳头打出外，手板弯进里，对顾客越浪費越好，对店里越节省越好，这是我們的‘生財之道’，希全体同仁切記之。”按照过去的常規，这种点名是解雇的預兆。后来挽了好多人去向老板說情，才勉强保住了飯碗。但是，我亲眼看到有些职工因为不願干这种哄嚇騙的勾当，而被老板开除了。如有一次，一位顾客到店里来买白府綢，零售价每尺七角，那位顾客要买一匹，按照規定，买一匹是可以打折扣的，但是老板却暗示接待那位顾客的职工吳某以每尺八角出手。吳觉得这样做不好，就問老板：“为什么批发价反而要加一角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話，他被老板开除了。

老板剝削花样多

天下烏鴉一般黑，老板都是一票貨色。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一九三八年，大昌協記綢布商店逃难逃到“英租界”的南京路上来，第二年，以六万五千元盘掉了。新老板曹凤声，是个鴉片鬼，矮个子，瘦长臉，为人阴險，詭計多端。他一上任，就把大昌協記綢布商店留下来的一些老年职工都解雇了。

当时有个叫江嘉生的老年职工，因为家里的生活全靠他，一再要求要留下来，可是曹老板却把臉一沉說：“你也不算算你的年紀。”江嘉生回到苏州乡下，生活无着，整天悶悶不乐，終于餓死了。我当时正是壮年，被留了下来。大昌祥一开門，就显出了曹老板的“能干”。他来个“关店大拍卖”，店堂里贴着五光十色的紅綠告示，各种料子来一个彻底的改头換面，哄嚇騙的手段层出不穷。每天要营业十六七个小时，中間連喘息的机会也沒有。这样一連三个月，每个职工累得身上輕了三、四斤，可是連工資都沒拿到，只拿了少得可怜的厘金；而老板一轉手竟賺进了四万元。

在旧社会，高利貸剝削有印子錢、皮球錢利上滾利的算法，而曹老板对职工的工資，却来个扣上加扣的复扣制度。請假工資全部照扣，續假一天扣二天，續假再过期一天要扣五天。这样不算，还有月度复扣和年度复扣。如一个月工資三十元，請假十天扣去十元，还有二十元再按三十天計算，每天六角六分，再扣去十天，这月实际到手只有十三元多一些。到了年終，再按三百六十五天計算，进行年度复扣。我是难得請一次假的，有一年生了病，

身体实在支撑不住，請了两天假。按照曹老板的复扣制度，这里扣那里扣，到年底一算，竟被扣去半个月的工资。那时，店里有一个职工，請假回安徽乡下去，当时因交通时常受阻，无法按期赶回，他心里一急，就生起病来。在家一共耽了半年多，后来回店，狠心的曹老板竟扣了他五百多天工资，說这还是照顾他的。于是他只得把家庭生活置于不顾，給资本家白做了一年半。曹老板这种毒辣的工资复扣制度，不知害死了多少人。我有一个相处二十五年的知心老同事，名叫叶燧生，是大昌祥的“开门元老”。他熟悉业务，为老板卖了一辈子的命，后来得了便秘病，无錢去看病，請假休养吧，又怕复扣工资，于是他暗地里买了点泻药吃。泻药下肚，大便是通了，可身体更坏了，变成了黄疸病，面孔像黄蜡一样，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可是他还是摇摇晃晃地站在店堂里。职工兄弟看到这情况，便把他送了回去。到了家里不久，我的好友就死了。

曹老板对职工的剝削是不会滿足的。他訂出了这种毒辣的工资复扣制度以后，还觉得太便宜了职工，因此又来了个緩发工资。每月原定十号发工资，他总要拖到十五、六号才发，而且每次发工资都要

曹老板签字才好拿。一九四八年有一个月，大家都等着拿工资，曹老板却带着太太到杭州玩儿去了。等他玩罢回来，已是二十六号了。全店一百多个职工家属的肚子饿得哇哇叫，可是他却慢条斯理地说：“急什么，工资又不会少你们的。”可是，这时发出的工资，已不值原来的一半了。最低的工资一个月只值一双呢子的鞋面料。我们棉布行业的工资都是固定工资加厘金制。按照规定，厘金应在下月初发，而曹老板总是要拖到十五、六号。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物价连日狂涨，当时我算过一笔账，每天所得厘金如果当天给我，生活还可以勉强过得去。但是曹老板却拖到下月十五号发出来，这样，一月的厘金成了一天的厘金。我每月拿到几斗米的工资，怎么能够养活一家五口人呢？我把家里的东西卖得连箱子底也翻过来了。那时，家里把米当茶叶一样，在清水里撒一些，一天三餐喝着薄粥汤。我的一个最小的孩子苦苦地对他娘说：“妈妈，等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吃一餐饭好吗？”

柜前有虎后有狼

“店堂好比虎狼窩，前有老虎后有狼外婆”，这是老店員的經驗談，当时的情况确是这样。一九四六年的一天，店堂里来了三个国民党軍官，老年职工虞乾欽因为没有立即上前招呼，为首的那个三角眼的軍官，用右手把烏龟壳似的硬帽子向脑后一推，捋起袖管，伸出巴掌噼噼啪啪地朝虞乾欽的臉上打来。打罢以后，他还拍拍胸脯冷笑說：“哼，張开眼睛瞧瞧，老子是什么样的人！”虞乾欽只觉得眼前火星直冒，臉上被打得紅一块紫一块，两眼露出憤怒的目光，逼視着那个丘八，但就是沒敢頂嘴。因为这是有个先例的，一九四四年，职工張建华頂撞了那些丘八，在端午节的时候，被老板开除了；同业中的中华綢布商店职工李关庆，因为被顾客打耳光，他不服打，立即被老板开除。当时我自己編了首順口溜：“伙計一年做到头，只好天天低着头，你要稍微抬起头，就要打痛額角头，老板曉得吃排头，弄得不好卷被头。”

柜前是这样，那么柜后呢？曹老板为了殘酷剝削职工，还訂出了一百二十条店規。他把这店規写

在紙上，配了个大鏡框，挂在二楼扶梯口。我們一早起来，先要看一看这只鏡框。每个职工都得照章办事，稍有違犯，輕則罰款、記过，重則解雇、开除。所以我們都把它叫“套在职工頸上的一百二十条繩索”。其实，曹老板套在我們职工頸上的繩索决不止一百二十条，他随时都可以找你麻煩。早上起来吃早飯，就碰到了限制吃飯的店規。曹老板公开貼出布告，每人每餐限吃两碗，而且都是小碗。开头是每日两干一稀，后来中、晚两餐要干稀各一碗对搭，而且吃的都是霉米。吃罢早飯上廁所，又碰到了上廁所的店規。店里有一百多个人，可是楼下沒有廁所。老板为了监督职工上廁所的时间，把馬桶放到三层楼，規定大便不得超过五分钟，草紙只准用半張，腹瀉也不例外。在二楼扶梯口，老板設了一个檢查大便的卡子（关口），派专人坐在那里，記錄每人大便的时间及发放草紙的数字。如果違反制度，那又得罰款。曹老板对“大便賬”是查得很勤的，如果发现大便的人次与所用的草紙不符，就要追根究底，查个水落石出。他还把每个人的大便时间总和起来，再加上每个人出外买大餅油条、理髮洗澡等时间，在年底算总賬扣你的工資。平时大

便好，你要立即去签到，如果忘了签到或过了时间，又要罰款；接着就有人来检查每人胸前别的、写着大昌祥店名并編有号码的证章，如果查到有人沒有别，輕的罰款，重的开除。如有一个姓汪的青年职工，那天早上因为換了一件衣服，忘了别证章，当场就被老板开除了。职工如果不慎打碎了飯碗，当你还沒来得及拾起碎片时，老板已派人来向你討賠款了，弄得不好还会被开除。如有一次，茶房陈阿康在擦玻璃杯时，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就买了一只賠給店里，可是曹老板却对他說：“你手脚大，我养不起你，你还是回家去享福吧。”就这样他被开除。后来陈阿康的老婆为了今后的生活，变卖了家里的东西，备了厚礼再來說情，老板才勉强答应留下来。可是这样一来，陈阿康的家境更困难了，生活沒有着落，又担心再被开除，整天忧忧郁郁，不到两年，終于病死在店里。

打烊以后，老板还有一个門禁制度。每天晚上十时落鎖，逢五逢十放寬到十一时，不管你家在上海或外地都是一样。如果你有事外出回来，超过一分钟也要关在門外或被开除。职工范劍虹有事外出，回来时見离門禁的时间沒有多久了，立即打一个电

話來請假，剛好那天曹老板从鴉片窩回來，他親自接了電話，說：“你回來也好，不回來也好，你要玩可以玩個痛快。”范劍虹一聽，心里着了慌，不管袋里有沒有錢，立即坐了出租汽車趕回來。車子开到門口，剛好十點鐘。這時，大門已被那把无情的大鎖“咔嚓”一聲鎖上了。就這樣，范劍虹被開除了。像這樣因為違反門禁制度而被開除的職工不下五、六個。

覺醒起來作鬥爭

曹老板對我們職工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使我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一九四八年，物價飛漲，曹老板大量進貨，囤積居奇，採取“不賣主義”。我們就來個針鋒相對的鬥爭，進行勤工運動，從早上開門到深夜都做生意。這一來，可觸到了曹老板的痛處。他暴跳如雷，只得去請后台老板。巡捕房里來了一批全副武裝的警察，為首的一個還凶相畢露地亮出手槍，槍口對准我們職工，厲聲地說：“你們再不停止行動，我要開槍了。”他的話音剛落，人群中竄出一個人來，原來是老年職工虞乾欽。他一拍胸脯對着那

个坏蛋說：“你有‘种’先开我一枪！”“你敢！”“你敢！”群众的吼声如排山倒海，吓得那个坏蛋倒退了几步，差一点把手枪掉下來。在我們团結一致的斗爭下，他夹着尾巴溜跑了。反动派为了挽回面子，就来了最后一着，要抓我們的代表。我說：“要去大家一起去。”我們跟着代表一起到了伪警察局。曹老板勾結反动派，对我們代表使用种种威吓手段。我們始終团結一致，坚持斗爭。反动派对我們沒法，只得把代表和我們一起釋放了。釋放以后，我們繼續不断地坚持斗爭，一直到上海解放。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又一次斗爭开始了。全体职工在店堂里举行控訴会。曹老板避而不見，他悄悄地溜到大东旅館开了个房間，叫一个狗腿子在店里探听消息，随时向他密报；曹老板听到我們竟然在“他”的店堂里控訴起他的罪行来，立即吩咐狗腿子打电話給公安局，誣告有暴徒搗乱营业部。

正当我們憤怒的控訴会在进行的时候，忽然来了两个公安人員。会场顿时轰动起来。公安人員看到“廢除苛刻的一百二十条店規！”等标語和漫画，立即笑嘻嘻地对大家說：“同志們不要乱，大家坐

好。”两人边說边做着手势，然后向会场主持人問清了情况。一个公安人員上台讲话：“同志們，你們不要害怕，现在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公安局也是人民自己的公安局，我們不但不会抓你們，而且要保护你們，因为你們的斗争是正确的，祝你們斗争胜利！”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会场里的凱歌声，早已通过狗腿子傳到了曹老板的耳里。这个一向欺压职工的曹老板，此时也泄了气，他懶洋洋地拿起电话听筒……。不一会，会场主持人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消息：“刚才曹凤声打电话来，答应廢除一百二十条店規，其他的要求也同意协商。”会场上再一次响起了雷鳴般的掌声，我也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老店員苦尽甜来

解放以后，店員真是翻身了，再不受老板的压迫和剝削了。我們的生活真正得到了改善，不久又实行了劳保。最使我感动的是，五年以前与我同事二十五年的老店員虞乾欽同志退休了。領導上亲自送喜报来，向他握手道賀，祝賀他为商业事业貢獻

了自己的力量，并把他送上火車。現在，虞乾欽同志享受劳保工資，在西安兴平与他的老伴、女儿一道，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看到今天虞乾欽同志幸福的晚年，不由使我想起同样与我同事二十五年的叶燧生的悲惨遭遇来。新社会与旧社会，竟有这样的天壤之别，这怎么不叫我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呢！我現在虽然越来越老了，可是工作的劲头却是越来越足了。在店堂里，我是千方百计为顾客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九五五年，我因为工作上作出了一点成績，并創造了对折裁剪法，就被評为劳动模范。一九五六年在文化廣場召开的一次授奖大会上，在成千上万人的热烈的掌声中，我登上了主席台，接受了首长授于我的奖状、奖章和物质奖励。这天回家以后，我一夜沒有合上眼，几十年的往事像电影似的在脑际掠过，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不由地低低哼起那首自己喜爱的民歌来：

从前店員做到老，
不如路边一根草；
現在店員老再老，
思想进步生活好。

“柜前有虎后有狼”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現在是柜前柜后成一家了。职工在店里，有党支部和行政领导的关怀，他們从政治思想上，經濟生活上处处关心我們。职工身体稍有不適，就劝我們休息，生了病还上門来看我們；在柜台外，顾客与我們的关系也亲如一家人，特别是那些工农兵劳动人民，他們称呼我們老年店員为老伯伯、老同志。我們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情，他們总是要謝謝我們。看看这些可亲可爱的顾客，我怎么不要千方百计地为他們服务呢。每当一天工作完毕，回到家里，靜坐下来，白天在店堂里碰到的那些顾客的熟悉的面孔，很自然地会在脑子里重現出来，与解放前那些滿臉橫肉，面目猙獰的面孔相交映，更体会到今天店員的幸福。

(顾忠慈 整理)

“药老虎”发家史

張文显

上海北京路上，有家六开間門面的药店——徐重道国药总号。解放前，它是旧上海国药业中数一数二的一家大药店。这家药店的老板是当时有名的一只“药老虎”。那时候，这个老板在旧上海市区开设的分店就有十七家，还开了药酒加工厂、制药厂、制胶厂、药材行等。說来也怪，像这个老板自己吹嘘的“规模宏大的中国大药店”，却是用二十几只銀角子起家的。

徐重道老板靠了这二十几只銀角子，把药店弄得这么大，是不是像有些資本家所說的是靠“勤儉起家”的呢？不，这是騙人的鬼話。像其它資本家一样，在徐重道老板的“发家史”中，不知隐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罪恶！我从小就在徐重道药店当学

徒，听到和亲眼看到这只“药老虎”怎么吃人的许许多多事实。这里，我所叙述的只不过是一些片断。

二十几只角子起家

徐重道国药店老板，浙江慈溪人，是我的同乡。他曾在汉口帮他叔叔照管店务，眼看店里生意兴隆，非常羡慕，一心要走叔叔的道路。一九一五年，他便到上海来“淘金”。到上海时，他身边衣袋里只剩下二十几只角子。怎么起家呢？他说：“若要发，众人头上刮！”后来，他看准了一个好兆头：那时上海滩上，妓院成堆，很多人患花柳病。他便向熟人借了一点钱，在那时的派克路（现在的黄河路）上租了两间房子，挂上“徐重道国药号”的招牌，出卖“妇女白带丸”、“五淋白浊丸”等等。他没有学过什么医，竟在自己的小店里，一面卖假药，一面做假郎中。

开头，店里没什么生意，他就站在店门口，看到过路人便打躬作揖，笑嘻嘻打招呼。日子一久，人头熟了。附近女佣人生了病进不起医院看病，也常到他店里来问病买药。当这些女佣人到徐重道店里来看病买药的时候，这个老板又在她们身上动脑筋，说什么把零星钱存到徐重道店里，利息大，

又可靠。有的女佣人贪图利息大，见他逢人便笑，“人缘又好”，便把一些血汗钱存进他店里，日积月累，这笔数目倒也不小。但这个老板心里明白，在这些女佣人身上榨不出多大油水。为了招徕更多主顾，他便在假药仿单上印了十二个黑色大字：“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向买主宣扬自己为人“正直”“公道”，同时逢人夸耀自己的药店是“良心店”，徐重道是以“道德”为重，为民解除疾苦。当时有不少人受他欺骗，徐重道国药号的生意也慢慢兴隆起来。这个老板盘剥了一些钱，不久，便在成都路开了第二家徐重道国药店。

徐重道老板的家，就这样发起来了。

“优待券”和木图章

一九三〇年，这个老板已在上海开了第十个徐重道国药支店了。这一年，他在北京路上开了徐重道国药总号。他在开国药总号的时候，为了欺骗顾客，不惜工本，店堂里全套红木设备，门面装饰得富丽堂皇，砌上什么“国药环球总店”、“首创发明参燕百补膏”、“养血补脑汁”、“妇女调经药”等等，来欺骗顾客。

資本家的欲望是永远也不会滿足的。徐重道药店一月一月开出来，这个老板整天动脑筋，打鬼算盘，来实现更大的騙局。

有一天，徐重道老板叫来一个临时工，对他說：“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給你一辆自行車，到外面去兜圈子。看到弄堂口、馬路上有医生招牌，你把它抄下来，几弄几号，叫什么名字，拿来我看。”从早到晚，这个临时工的自行車踏遍了上海大街小巷。一个个医生的名单，出現在老板面前了，他就把医生的名字編了“一〇一”“一〇二”等等代号，叫自己的亲信采办礼物：名医送皮貨；一般医生送扇面、雪花膏；业务清淡的医生送水果糖。随礼物送去的，是一叠叠“优待券”，上面印着“誠意为病家服务，七折优待”等文句。虽然礼分輕重，但医生感到情面难却，开好药方，就順手递給病家一張“优待券”。旧社会里，中药利潤很厚，一分本錢，三分五分利潤不足为奇。当时行业中有一句話：“吃的黃連飯，穿的桂朴衣”，意思是指經營“黃連”、“玉桂”、“厚朴”等中药都是好生意，利潤大，而且常常是一种規格，可以定出几檔价目，看人論价。所以“优待券”不过是用来招徠生意，騙騙病家的。

店里生意好起来，这时，老板走到切药房里，拍着切药师傅的肩，笑嘻嘻地说：“同是一根药材，你切下来分三等，两头切得小点，中间切得大点，分成等级存放。”他又叫自己的亲信去刻了“謀”“民”“众”“健”“康”五只木图章，对职工说：“你们做生意脑子要活络点，看人头做生意。对衣着好的人，药方上敲个‘謀’字图章，药材拣中心段的大片子，药价开得大点，好敲，就多敲一点钱；穷人来买药，敲‘健’‘康’图章，把坏药放进去！”

代客煎药的真相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人口剧增，因居住条件不好，患病的人日渐增加。这个老板灵机一动，认为这正是推销积压次药的好机会。这时，上海的大街小巷、电车上、报刊上、电影院里，出现了一批新式广告：“徐重道药店，首创代客煎药，随接随送，日夜服务”；“本店诚悬为病家服务，首创代客煎药，选料道地，配煎认真……”。有些人看到这种广告，贪图方便，把药方往徐重道药店里送。徐重道老板站在店堂里，眼看着顾客把药方送进来，总是堆着笑：“你们放心

好了，我們馬上就煎，煎好就送。”顧客出了門，他就想方設法把那些霉藥、壞藥放進藥罐，還只准煎藥師傅把頭汁、二汁藥合煎一次，多放點水，一燒開，就倒進兩隻藥瓶。

在抗戰初期，上海設立了許多難民所。老板又動出了鬼腦筋，他向這些難民所的主持機關去游說：“我徐重道是良心店，重道不重道，只要看我這塊牌子，現在國難臨頭，全上海難民所的藥，我全部包下來，七折優待，為難民煎藥送藥。”就這樣，上海玉佛寺、金司徒廟、浙江路等十多個難民所里幾千個難民，配藥煎藥全部由徐重道辦理。老板把這筆生意抓到了手以後，就對煎藥師傅說：“難民藥方一來就是一百多張，你們來不及稱，不要稱了，用手抓兩把算了！”煎藥師傅不同意，他就說累死你活該。眼看煎藥生意越來越好，霉藥、蛙藥暢銷一空，徐重道老板發了大財，樂得心花怒放，在背里常說：“真是種田靠天，生意靠騙呵！”

挂羊头 卖狗肉

資本家利欲熏心，哪顧病家死活！生意越好，心腸越毒。有一年夏天，他看到勞動人民中暑的很多，

就“发明”了一种“甜质金銀花露”。当时他又在各大电影院大做广告。有些人上了他的当，都来买这种金銀花露。徐重道老板站在药房間里笑咪咪地对职工說：“金銀花露来不及用蒸汽水，用大鍋煮煮就算了！”职工不同意，要他照方配制。他却說：

“你曉得什么！上海人吃噱头，只要每个人上我一次当，我徐某就可发大財！”制造丸散膏丹，各种药品都有一定份量，可是这个老板却动了許多脑筋，专门写成一本“徐重道罕有丸散配合簿”，上面用毛笔写上了“牛黄至宝丹”、“紫雪丹”等等药名，凡是成方中用到的麝香、羚羊角、犀角等貴重药品的份量，都被他减去一半，甚至麝香里还要掺盐卤。有一次，他的一个亲信把盐卤偷偷放进麝香里，被职工王占华看见了，当场把他抓住，經理走过来，瞪着眼睛說：“是老板叫放的！”后来，老板来了，他好笑地对合药师傅說：“你們尽管放心大胆做好了，药料磨粉做丸药，神仙也难认真伪。”一次有人把一只死羚羊的角拿来卖给徐重道。死了的羚羊角不能合药。而老板的亲信却买下了这只死羚羊的角，把它配进丸药里去了。就是一般的成药制造，老板也不肯輕易放过。如治咳嗽的“枇杷膏”，妇女

調經的“益母膏”，藥和糖都有一定的比例，他却以利潤為標準，如藥價貴時，就多摻糖，少放藥。“虎骨木瓜酒”是治筋骨痠痛的藥酒，有祛風活血功效。處方中有虎骨膠、木瓜、紅花等十幾種藥品。老板說，“這酒是吃着玩的，只要飲了能醉就達到功效了。”於是他把十幾種藥料全部減掉，只用生黃枝子打碎泡在水裡，摻入土燒酒中，加點糖精，看來顏色好，味道甜，可是治療效果一點也沒有。解放前，這個老板靠偷工減料，掛羊頭，賣狗肉，不知撈進了多少銀洋，坑害了多少病人！

對於老板種種弄虛作假，偷工減料，欺騙病人的行為，職工十分氣憤，不斷提出抗議。但藥店的印把子攥在老板手裡，何況店裡還有他的親信、狗腿幫忙呢！

殘酷的剝削和壓迫

這個老板對店內職工的壓榨是十分殘酷的。學徒進店前，他先笑嘻嘻地問介紹人：“人品長得好嗎？口齒伶俐嗎？出手快嗎？什麼地方人？”凡是達不到他的要求，他是不收的。職工進店以前，也要再三盤問介紹人：“上海有家屬嗎？”要是上海有家

屬的，他也不要，怕他們“手脚不干淨”，把店里的東西拿回家去。每年逢時過節，他總要辭掉二三十人，招進一批幫工。據一九四二年的統計資料，徐重道藥店一百多名職工中，全部不超過三十歲，快滿三十歲的職工，名字上已經劃了紅圈。老板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道理很簡單，因為舊社會失業者很多，辭掉一批職工，招收幫工，可以在這些幫工頭上打算盤。一九四七年，徐重道藥店又招收了一批幫工，這些幫工進店以後，老板規定：先試用三個月，試用期滿了，正式成為幫工的，工資一律打六折。一進店門，還要填三份關書：一份“僱用書”，一份“荐保書”，一份“守則書”。在這些關書上，規定入店後，無條件放棄訴訟權，控辯權。他還訂出了許多店規，縛住職工的手脚，以便可以隨意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請你滾蛋。

有個青年工人名叫張水堂，由於受盡老板折磨，得了肺病，吐血。他偷偷地請醫生開了藥方，準備配兩服藥吃。老板知道了他有肺病，就把他辭退了。還有更令人可恨的事：有個孤老头子名叫老洪頭，在徐重道第二支店做丸散師傅，無依無靠，到晚年才討了個老婆。老板知道了，覺得他有了家

累，不能更多地受压榨，借口說：“他討了老婆，一定要偷东西，不能再用了！”八月中秋那天，老板給了他一張卡片，上面写道：“本店无意雇用，另請高就。”老洪头拿了這張催命符，回到家里，老婆因他养不活家口，走了。后来他自己活活餓死在店門口的人行道上。

我們这些侥幸保牢飯碗的人，日子也不好过，真像药店柜台上的揩布，揩来揩去尽是苦。記得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們职工从早到夜累死累活給老板卖命，老板給我們吃的是什么呢？他仓库里大米堆得小山高，发了霉，叫职工炒焦磨粉，制成“五香飯灰”，卖给病家。給我們吃的常常是屙着石砂的面粉六谷糊，难得吃上几頓烂飯薄粥。他还嫌我們胃口大，暗里关照飯司务：“飯要煮得稀烂，粥要燒得稀薄。”說到工資，真低得可怜，一个月的工資只能买二斗米，这样我們自己顾自己还很困难，哪里还顾得上家？如果碰到家里有人生病，那就更惨了。有个职工名叫岑秀章，他女儿生了病，因为没有錢延医买药，病死了。很多职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白天忍受着繁重的工作，一到夜里，瞞着老板到街头去做小販。这么微薄的工資，狠心的老板还

常常不給发。这种时候他会笑着说：“你們不要急，我实在沒有錢，有錢会給你們的！”可是这个常常喊“沒有錢”的老板，药鋪分号却开了一家又一家。

职工們恨透了老板，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上午，二十四个职工，在店楼上开了个小会，提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資。誰知道，会还没开完，徐重道药店就被伪警察包围了，伪警、流氓手持武器冲到楼上，用枪口对准职工，說：“不許动！一个个名字都写上！”这时，徐重道老板和經理也来了。职工紛紛质問：“我們犯了什么法？”老板露出猙獰的面目，指着职工說：“这是非法开会，这是搗乱！”他嘴巴一歪，伪警就把他們带到楼下店堂里，排成队，要用绳子綁起来。这时，經理走过来了，假惺惺地笑着说：“不用綁了！带走吧！”

就这样，这二十四个职工被抓进了監獄。第二天，老板串通伪警察局，把他們无理解雇了。

新藥店 新作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劳动人民終於熬出了头，見到了太阳。一九五二年，由于徐重道老板在解放后繼續偷工减料，危害病人，我們和他

开展了斗争，列举大量事实，揭穿了他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项运动，徐重道药店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人民政府为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国药企业中提倡实事求是的经营作风，建立了各种科学的责任制度，提高了服务质量。进药、配药、煎药、送药都有严格的检查制度，真正做到了为病人负责。譬如拿煎药来说吧，各种药的煎熬时间，都有一定的规定，在操作过程中，还做到药汁煎透，药渣撇干，按照病人规定时间，及时送上门；来方配药，也是同样做到尽量满足需要。如有个病人需要服用石榴树根，但这种货物，药店是不备的，为了满足病人的需要，我们店里就派出三四个职工，骑着自行车出去采购。他们跑遍了上海的公园、苗圃和花鸟商店，都没有这种东西。后来，又专门派人到农村去采办，并把石榴树根送到病人家里。在药物质量上，更是精益求精，从原料到成品，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复核，尽量做到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解放后，我们职工成了企业的主人，有的职工当了公方经理。我们职工的生活，也逐步提高，生

老病死有劳保。过去不少患肺病的职工，都得到了治疗，恢复了健康。领导上对我们各方面都很关怀，店里还设立了图书站，不少工人进了业余文化学校。经过党的教育，我们职工的政治觉悟都有提高，有的同志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我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〇年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想想过去徐重道这家黑店，看看现在徐重道国药号的新面貌，真是两个世界，两种景象。

（若 芳 整理）